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七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五年九月

## 桑哥輔政碑事件探微—— 以翰林官僚張之翰的仕宦轉折為線索

毛海明\*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元代前期政治史上的桑哥輔政碑事件。這起事件，曾令眾多翰林官僚捲入其中，遭受處罰。事件的發生與處置，有著豐富的政治內涵及深刻的政治意義。長期以來，囿於史料有限，學術界對此事件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探討。本文鉤稽史料，以曾經任職翰林漢人官僚張之翰的仕宦轉折為線索，考證桑哥輔政碑事件中的若干史實，並分析和討論了元世祖至元後期政治鬥爭的若干細節問題。

**關鍵詞：**桑哥理財 輔政碑事件 張之翰 漢人官僚 至元後期政治

---

\*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桑哥理財是元世祖忽必烈統治時期的一件大事。理財活動在忽必烈的支持下，由吐蕃人桑哥主持實施，<sup>1</sup> 後因蒙古、色目貴族官僚的極力反對，而最終失敗。雖然整個理財活動前後不過四年，但在元代前期乃至整個元代政治史上卻有著重要影響。桑哥本人被視為忽必烈時期繼阿合馬、盧世榮之後的又一位理財權臣。理財期間，桑哥權傾朝野，「專擅柄政」，進退黜陟，「皆由於己」。<sup>2</sup> 及其倒臺，他被殘酷地處死，<sup>3</sup> 黨羽受到清算，或被誅殺，或被貶斥。一些不屬於

<sup>1</sup> 桑哥族屬，在史料中有不同的記載。波斯文史料《史集》記其為畏吾兒人。見刺失德丁著，波義耳英譯，周良霄譯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七章〈忽必烈合罕紀〉，頁360。藏文史料《漢藏史集》則稱其為吐蕃人。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漢藏史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上篇二四，〈桑哥丞相的故事〉，頁179。學界主張不一。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漢藏史集》為國內所知受到重視之前，學界一般採信《史集》所載，認定桑哥為畏吾兒人。義大利學者伯戴克 (Luciano Petech) 在一九八〇年較早利用《漢藏史集》，主張桑哥是吐蕃人。見氏著，〈元代的藏族政治家——桑哥〉，《東方學報》（匈牙利）34（1980）；後收入沈衛榮譯，《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二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頁213-214；參見沈衛榮，〈一部珍貴的藏文史集——《漢藏史集》〉，《西藏研究》1987.2：135-138。八〇年代以後，雖有個別學者堅持桑哥是畏吾兒人的觀點，見羅賢佑，〈論元代畏兀兒人桑哥與傑哲篤的理財活動〉，《民族研究》1991.6：102-106，但更多學者依據《漢藏史集》，認為桑哥是吐蕃人，見仁慶扎西，〈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西藏研究》1984.2：53-54；楊德華，〈元代藏族宰相桑哥理財的政績〉，《中國藏學》1995.4：64-69。最新的研究調和二說，認為桑哥是藏、畏合璧家庭的後裔，見尹偉先，〈桑哥族屬問題探討〉，《民族研究》1998.1：80-83。本文並不涉及桑哥族屬的探討，為敘述方便，採用多數學者認同的桑哥是吐蕃人的觀點。

<sup>2</sup>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卷二〇五，〈桑哥傳〉，頁4575；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二，〈善諫〉，頁26。

<sup>3</sup> 桑哥之被處死，《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只簡單地記載：「（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丁巳，桑哥伏誅。」（頁349）據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明代修補元至治元年刻本影印），卷二〇，〈即事三詩奉呈幹臣明府詩友〉，詩句中央註：「向奉御禿列死，先令野狸爪齧其膚，今相哥（按即桑哥）自請死同禿列。○○（按當指代皇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上謂之曰」〔頁24b〕）：『若交汝便死，天下人謂我何？』」（頁16b-17a）詩作於至元二十八年（1291）六月二十六日。按桑哥七月伏誅，此處「六月」或誤。《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四月」（頁24a），按後文夾註有「今歲自二月至五月凡兩降詔條」之語（頁24b），「四月」顯誤。可知桑哥當被以殘酷的方式處死。《秋澗先生大全集》亦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00-1201冊。以下簡稱《秋澗集》。藏文史料《漢藏史集》上篇二四，〈桑哥丞相的故事〉，記載桑哥之死，云：「把桑哥丞相交使者帶走以後，第二天皇帝派人去聽桑哥說了些什麼。去的人回報說：『他到刑場之時，對行刑的人說：你們的刀要鋒利一點，手要輕一點，設法

其黨羽的人，或因曾經參與、支持理財，或因監察不力，也受到牽連和清算。理財時期制定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在桑哥倒臺後，則被廢止。這些史實，在中外史籍中都有所記載，也為治元史者所習知。<sup>4</sup>

桑哥及桑哥理財事件一直是學術界考察元代前期政治、經濟史的一個重要課題，現有研究成果豐富。<sup>5</sup> 然而，對於桑哥理財時期的若干細節，卻仍存待發之覆。桑哥輔政碑事件即是一例。這起事件曾令翰林官僚閻復等人牽涉其中，遭受處罰。關於該事件，有明確記載的僅見於《元史》紀、傳。<sup>6</sup> 但由於其中透露的信息有限，除閻復之外，還有哪些人捲入事件，他們的政治命運及境遇如何，事件的發生與處置，有著什麼樣的政治背景，這些都不得而知。長期以來，學術界對該事件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探討。事實上，要解答以上問題，剖析桑哥輔政碑事件，不得不從一位翰林官僚在至元二十九年左右仕宦轉折說起。此人因捲入桑哥輔政碑事件，受到貶職外任的處分。政治失意後他悲憤隱忍，抒發幽思，以至鬱鬱而終。由於相關史料記載隱諱、含蓄，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關注和利用，致使他的這一段經歷長期不為人知。這位命運頗帶悲劇色彩的翰林官僚就是元代前期的著名文士張之翰。對於張之翰，學術界曾有所關注，但研究主要側重於文學方面，<sup>7</sup> 對其事蹟則鮮有討論，對他曾捲入桑哥事件更是毫無所知。本文通過張之

---

快一些。劊子手說，你念的這些做不到，該怎麼辦，我心裏清清楚楚的。』皇帝說：『他們竟使我的桑哥在臨死時心中痛苦，將這些壞蛋各鞭打一百零七下！』」（頁 184）其中記載與王惲所述雖然頗有異同，如其記桑哥被劊子手用酷刑殺死，並非忽必烈本意，王文則稱桑哥是因忽必烈的指示而被殘酷處死，但也清晰地表明桑哥是以殘酷的方式被處死。又按其中「各鞭打一百零七下」的記載頗合元代刑法制度，其對桑哥被處死過程的描述當有所本，或許更為可信。

<sup>4</sup> 宋濂等，《元史》卷二〇五，〈桑哥傳〉，頁 4570-4576；刺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七章〈忽必烈合罕紀·紀異密阿合馬之後充合罕維昔兒之畏吾兒人桑哥及其結局〉，頁 360-366；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上篇二四，〈桑哥丞相的故事〉，頁 179-184。

<sup>5</sup> 參見伯戴克，〈元代的藏族政治家〉，頁 208-230；王頊，〈「斂財」之臣與元世祖——試論阿合馬等的「理財」及其與忽必烈的關係〉，《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5（1981）：60-69；仁慶扎西，〈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頁 53-59；周良霄，《忽必烈》（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第一二章第二節〈桑哥與尚書省的復設〉，頁 201-207；羅賢佑，〈論元代畏兀兒人桑哥與僕哲篤的理財活動〉，頁 102-106；楊德華，〈元代藏族宰相桑哥理財的政績〉，頁 64-69。

<sup>6</sup> 相關記載，詳見後文論述。

<sup>7</sup> 見劉立華，〈元代詞壇上的父子詞人——張之翰、張堃詞研究〉（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6）；王樹林，〈元前期北宗文派七家文集彙考〉，《南通大學學報》2008.5：57-

翰文集中的幾首詩詞，鉤稽史事，重新還原他這一段久被塵封的不幸遭遇。在此基礎上，進而揭示有關桑哥輔政碑事件的若干史實。本文的探討，或者有助於對桑哥理財事件，以及元代前期政治史有更多的了解。如有不當，敬請方家指正。

## 一・張之翰改任松江知府實屬貶降

張之翰（字周卿，號西巖，邯鄲人）是元代前期著名的漢人文士官僚。文章政事，皆有成就。時人贊他「學為通儒，才應時須」，將其與西晉名士陸雲相提並論。<sup>8</sup>《大明一統志》把他列入〈名宦〉，稱其「文聲政績並著，有古循吏風」。<sup>9</sup>他的詩文備受後人重視，清代四庫館臣曾評價：「其詩清新宕逸，有蘇軾、黃庭堅之遺，文亦頗具唐宋舊格。」<sup>10</sup>研究元代詩詞的學者則稱之為「元初的詞壇巨擘」。<sup>11</sup>其生平梗概，在明正德《松江府志》，嘉靖《南畿志》、《廣平府志》，清人編《元詩選》，民國《邯鄲縣志》等文獻中都有所記載。<sup>12</sup>張之翰一生的仕宦經歷大致是：中統（1260-1263）初年，任洺磁路知事；至元十三年

---

59；鄧瑞全、孟祥靜，〈張之翰《西巖集》點校整理劄記〉，《歷史文獻研究（第三十二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211-213。

<sup>8</sup> 李謙，〈張之翰神道碑銘〉，陳斐修，嘉靖《廣平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據明嘉靖二十九年刻本影印），卷八，〈古蹟志・陵墓類〉，頁15a-b；白珽，《湛淵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8冊），〈贈張知府周卿〉，詩中云：「幾年天上張公子，今日雲間陸士龍。」（頁23a）陸雲事蹟，見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卷五四，〈陸雲傳〉，頁1481-1486。

<sup>9</sup> 李賢等，《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據明天順刻本影印），卷九，〈名宦〉，頁9b。

<sup>10</sup>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一六七，〈《西巖集》提要〉，頁1436。

<sup>11</sup> 黃兆漢，《金元詞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第三編第二章，頁169。

<sup>12</sup> 顧清修，正德《松江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正德刻本影印），卷二三，〈宦蹟上〉，頁13b；聞人詮等修，《南畿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未署出版年月〕，第24冊，據明嘉靖間刊本影印），卷一八，〈松江府・宦蹟〉，頁2b；陳斐，嘉靖《廣平府志》卷一二，〈賢行志・鄉賢〉，頁13a-b；顧嗣立、席世臣編，《元詩選・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224；李世昌等纂，民國《邯鄲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據民國二十八年刊本影印），卷一〇，〈人物志上・仕蹟〉，頁18b-19a。

(1276)，選置真定總管府知事，歷拜行臺監察御史、戶部郎中、侍郎，擢翰林侍講學士；至元末，除松江府知府兼勸農事。元貞二年 (1296) 卒於任，年五十四。

綜觀張之翰一生的仕宦經歷，至元末由翰林侍講學士外除松江知府的遷轉，頗有些不同尋常。要揭示其中關節，須先確定遷轉改任的準確時間。而以上文獻，除「真定總管府知事」的任職時間有明確記載外，對包括翰林侍講學士除任松江知府在內其餘仕宦遷轉的具體時間，均是語焉不詳。

張之翰曾著有《西巖集》一書，但原刻未能流傳下來，清人修《四庫全書》，從明《永樂大典》中輯出若干，釐為二十卷，即為今本《西巖集》。《西巖集》卷一五〈愛菊堂記〉云：

至元壬辰，余由翰林知松江。<sup>13</sup>

壬辰即至元二十九年。《西巖集》卷一六〈松江府廨記〉載：

松江，古華亭，……至元辛卯，直隸省郡。……越明年，某由翰林牧是郡。<sup>14</sup>

辛卯即至元二十八年。由這兩份史料，可以確切地知曉張之翰由翰林侍講學士改任松江知府是在至元二十九年。從大都出發，往任松江的具體時間應是在這年三月清明前後。《西巖集》卷一二收有一闕詞作，詞前序云：

辛卯清明日，嘗以〈金縷曲〉侑觴，今年獨無，可乎？因作〈摸魚子〉一闕以寄意。

詞中有云：

問誰知此時情緒？忽忽寒食相遇。……被幾葉風帆，催上江南路。無人自語。想五載居京，一朝得郡，却甚也能去。<sup>15</sup>

張之翰至元二十三年冬十月前往大都任職，<sup>16</sup> 到至元二十九年年初，恰是「五載居京」。其中所謂「一朝得郡」，指的應就是改任松江知府一事。其時「催上江南路」，已然登上啓程的「風帆」了。《西巖集》卷六〈和方虛谷寒食感事二首〉云：

<sup>13</sup> 張之翰，《西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4 冊），卷一五，〈愛菊堂記〉，頁 12a。

<sup>14</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六，〈松江府廨記〉，頁 3b。

<sup>15</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二，〈摸魚子〉，頁 9a。

<sup>16</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二，〈沁園春〉，頁 6a；陳棐，嘉靖《廣平府志》卷一二，〈賢行志·鄉賢〉，頁 13a；參見劉立華，〈元代詞壇上的父子詞人〉，第一章第一節「張之翰生平及詞的創作概述」，頁 9。

連朝春冷怪春遲，禁火藏煙早已而。客舍旋分紅杏朵，人家新插綠楊枝。  
安排北海樽中酒，準備東君路上詩。萬事皆從天素定，心頭為甚亂如絲。

畫出人間百五天，花飄紅錦柳飛綿。風光已是三月裏，況味全非十載前。

樓閣畫長喧語燕，江山春老怨啼鶯。明朝又向松江去，且寄閒愁在酒邊。<sup>17</sup>  
張之翰至元十九年任職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曾到過松江。<sup>18</sup> 因此詩中提及「十載前」，稱「明朝又向松江去」。這兩首與友人唱和的七律詩，應撰於「風光已是三月」，詩人已經「準備」出發，「明朝」赴任松江的至元二十九年寒食節，也即上引清明詞作的前一天。

張之翰的仕宦經歷中，至元二十九年的這次改任令人有些意外。翰林侍講學士與松江知府，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地位落差。<sup>19</sup> 翰林居清要之地，接近皇帝，「詞林清華無官守言責，日惟撰著為職」。<sup>20</sup> 松江偏處江南，知府以親民為任，「青燈逼案」，日以「催科」為務。<sup>21</sup> 無論從地位上，還是從事務性上講，二者都不可同日而語。張之翰本人就曾以「職分卑」自況，<sup>22</sup> 他是如何從一個中

<sup>17</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六，〈和方虛谷寒食感事二首〉，頁 16b-17a。按，方虛谷即方回（字萬里，號虛谷），事蹟見洪杏庭，〈方總管回傳〉，程敏政著，何慶善、于石點校，《新安文獻志》（合肥：黃山書社，2004），卷九五上，〈行實·文苑〉，頁 2401-2404。其時方回已致仕多年，「徜徉錢塘湖山間」，張之翰往任松江途中，他曾以詩餞送，見《西巖集》卷三，〈方虛谷以詩餞余至松江因和韻奉答〉，頁 5b-6b。

<sup>18</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四，〈秋聲集序〉（作於至元三十一年），云：「始余為行臺御史，道松江。……後十年，來牧是郡。」（頁 11a-12a）

<sup>19</sup> 職品上，翰林侍講學士是從三品，松江知府為正四品。見陳高華、張帆等點校，《元典章》（北京：中華書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卷七，〈吏部一·官制一·職品·內外文武職品〉，頁 196, 198。

<sup>20</sup> 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九，〈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頁 135。

<sup>21</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三，〈和愚公韻〉，「令嚴常是踏月散，事冗寧辭戴星聚」（頁 7b）；卷五，〈烏泥涇雨夜二首〉，「展轉不眠夜，催科未了心」（頁 6b）；同卷，〈樓居四首〉，「到郡已兩月，都無幾日閒。心移詩卷外，身在簿書間」（頁 7b）；卷六，〈方虛谷見和花朝復用韻〉，「催科星火千憂了」（頁 15b）；同卷，〈寄趙左丞時自鳳凰山夜歸舟中作〉，「青燈逼案公忙處，斜月穿舟夢覺時」（頁 18b）；卷七，〈和寇冷泉總管見寄二首〉，「此身僥倖催租了，便是雲間第一官」（頁 6b）；同卷，〈送程運副子充還都〉，「諸公若問松江牧，政拙催科第一人」（頁 11b）；卷八，〈立春〉，「松江租稅如山重，只願豐年養不才」（頁 9b）。按據內容，張之翰這幾首詩均當作於任職松江知府期間。

<sup>22</sup> 張之翰任職松江知府，曾與昔日的臺察同僚相聚，自云：「只因栢府交情好，忘却松江職

央的文學侍從之士——翰林侍講學士——轉任為地方官僚松江知府的呢？元人李謙在為張之翰所作的碑銘中敘及了他的這一段經歷，云：

尋倦值於北門，俄膺任于三吳。<sup>23</sup>

銘詞作「倦值」，是一種婉轉的文學描述。明嘉靖《廣平府志》中正式的說法是：

累擢翰林侍講學士，自請外補，除松江府知府兼勸農事。<sup>24</sup>

也就是說，張之翰是自己請求從中央出任地方的。事實果真如此？從他的詩文中，看到的卻是不同的答案。在前引至元二十九年清明赴任撰寫的詩、詞中，他自言被催上路，心「亂如絲」，「閒愁」滿腹，已然透露出些許傷感與無奈。《西巖集》卷六〈寄呈卜平章〉云：

往年曾送上鑾坡，萬里南遷奈命何。宰相薦賢今有幾，翰林為郡古無多。

赤心報向江湖遠，白髮徒勞歲月過。好放西巖巖下去，留將老耳聽賡歌。<sup>25</sup>

卜平章，應即康里部貴族官僚不忽木。此人漢化較深，自幼學於王恂、許衡，曾任提刑按察使、中書省參議，工部、吏部、刑部尚書等職。至元二十七年，任翰林學士承旨。二十八年，桑哥敗亡，任為尚書省、中書省平章政事。《元史》有傳。<sup>26</sup> 張之翰在戶部、翰林院時，當與不忽木有所交往。<sup>27</sup> 張之翰的詩作應撰於改任松江知府之後。詩中感慨「萬里南遷奈命何」，「翰林為郡古無多」，顯然是在感嘆出外南下，由翰林侍講學士改任松江知府的經歷。其自怨自艾、傷感無奈的心境，躍然紙上。這種內心真實情感的流露，很難讓人相信發生在他身上的職事變動，真的就是「自請外補」那樣簡單，只是一次普通、正常的內外遷調。

在《西巖集》同卷的另一首詩作〈寄徐容齋參政馬性齋右丞〉中，張之翰寫道：

謫居江海望蓬萊，九虎門深不下階。天上故人重會面，雲間薄宦也舒懷。

---

分卑」，見《西巖集》卷七，〈陪臺察諸君養樂園宴集二首〉，頁16a。

<sup>23</sup> 李謙，〈張之翰神道碑銘〉，陳槩，嘉靖《廣平府志》，頁15a。

<sup>24</sup> 陳槩，嘉靖《廣平府志》卷一二，〈賢行志鄉賢〉，頁13a。

<sup>25</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六，〈寄呈卜平章〉，頁19a-b。

<sup>26</sup> 見宋濂等，《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傳〉，頁3163-3173。

<sup>27</sup> 由詩句「往年曾送上鑾坡」推斷，張之翰當初任職翰林，很可能是出自於不忽木的推薦。張之翰還曾作詩為其祝壽，見《西巖集》卷六，〈壽木平章〉，頁2b。

廉車舊倚徐參政，右轄新添馬性齋。曾念歸舟行有日，麥花風裏渡長淮。<sup>28</sup>「雲間」是松江古稱。徐、馬二人分別是徐琰、馬紹。徐琰，字子方，號容齋，曾歷任陝西行省郎中、中書左司郎中、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江西及江浙行省參政、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翰林學士承旨等職。<sup>29</sup>「能詩能文，老於詞翰」。<sup>30</sup>馬紹，字子卿，號性齋，曾任尚書省參政、左丞，中書省左丞。元貞元年，改任江浙行省右丞。《元史》有傳。<sup>31</sup>張之翰與二人頗有交往。<sup>32</sup>這首詩當撰於元貞元年左右，與前一首主旨相同，都是寄詩舊人，希望得到奧援，改變「謫居江海」的境況。張之翰在詩中耿耿於「西巖」、「歸舟」，急於離開松江，自稱「謫居」，這已很明白地揭示出他遭遇貶降的事實。

綜合以上論述，可以斷言，張之翰至元二十九年由翰林侍講學士改任松江知府，是一次貶黜遷調，絕非「自請外補」那樣輕描淡寫。即使改任是其主動「自請外補」的結果，這中間也必定有著情非得已的苦衷，讓他不得不採取這種萬般無奈的方式。那麼，在至元二十九年，究竟是什麼原因，讓身為翰林侍講學士的

<sup>28</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六，〈寄徐容齋參政馬性齋右丞〉，頁16a-b。

<sup>29</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一五，〈裕宗傳〉，頁2890；曾廉，《元書》（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宣統三年層漪堂刻本影印），卷五八，頁5a；張鉉著，田崇校點，《至正金陵新志》（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卷六，〈官守志·題名〉，頁271；閻復，〈平江府報恩萬歲賢首教寺碑〉，錢穀編，《吳郡文粹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85-1386冊），卷二九，〈寺院〉，頁6a；李庭，《寓庵集》（收入繆荃孫輯，《藕香零拾》〔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五，〈創建灞石橋記〉，頁51a；吳澄，《吳文正公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據明成化二十年刊本影印），卷四二，〈元故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李公墓誌銘〉，頁8b；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據明本影印），卷二三，〈眾祭徐子方承旨文〉，頁5b-6b；胡儼，《頤庵文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7冊），卷上，〈重修徐高士祠堂記〉，頁88a-b。

<sup>30</sup> 方回，《桐江集》（收入阮元輯，《宛委別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卷五，〈東二〉，頁22a。

<sup>31</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馬紹傳〉，頁4052-4054。

<sup>32</sup> 《西巖集》中收有多首張之翰寫給他們的詩文，除這首外，另有卷三，〈寄答徐容齋參政〉，頁7a；卷六，〈和馬性齋韻二首〉、〈奉寄容齋大參為登舟一笑〉，頁14b-15a, 19b；卷七，〈和參政馬公韻〉、〈奉陪容齋諸公西湖雅集二首〉，頁6a, 16b。中華書局編，《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6），卷七二三六，收有一首〈奉賀西湖書院三賢堂成寄呈容齋大參〉，頁19a-b。此外，《西巖集》卷六，〈中秋會飲〉（頁5b-6b）；卷七，〈陪臺察諸君養樂園宴集二首〉（頁16a），也記載了張與徐、馬等人歡宴會聚。



張之翰受到貶斥，被迫遠赴江南，出任松江知府的呢？

## 二・張之翰貶任松江與桑哥輔政碑事件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張之翰由翰林侍講學士貶任松江知府，其中究竟，如對元代忽必烈政權後期的政治史有所了解，就會很自然地懷疑貶任或許與桑哥理財有關係。這種懷疑不無道理。首先，從時間上看，至元二十八年初桑哥倒臺，至元二十九年年初張之翰貶任。時間上一先一後，其間或許存在著某種關聯。其次，從事件的發展過程看，桑哥被罷黜後，隨即開始了對其黨羽的清算。其親信如要束木、八吉由、忻都等人，多被誅殺。<sup>33</sup>「事頗連及同列」，<sup>34</sup> 曾經參與、支持理財的官僚受到攻擊和處罰，理財機構尚書省被罷，「大臣多以罪去」。<sup>35</sup> 清算範圍也逐漸擴大，在桑哥專權時期未能盡到監察責任的御史臺臣受到責難、斥罷。<sup>36</sup> 清算一直持續到至元二十九年，不斷有官僚因牽涉其中被罷免、貶斥。這年三月的張之翰會不會也是被連及，以罪去職中的一員呢？從情理上揣測，存在著很大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當時與張之翰經歷類似，甚至是休戚相關的一個同僚，在至元二十九年年初，就是因為牽涉進桑哥事件，而被罷官。這個人即是閻復。閻復，字子靜，號靜軒。至元八年，由王磐薦入翰林；十四年，出任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十六年，再入翰林；二十八年，出任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元史》有傳。<sup>37</sup> 閻復被罷免時任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但被追究的責任卻是其任職翰林院時的作為。《元史·閻復傳》記載了此事始末，云：

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首命復為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先是，奸臣桑哥當國，嘗有旨命翰林撰桑哥輔政碑，桑哥既敗，詔有司踣其碑，復等亦坐是免官。<sup>38</sup>

<sup>33</sup> 參見周良霄，《忽必烈》，第一二章第二節〈桑哥與尚書省的復設〉，頁 206-207。

<sup>34</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葉李傳〉，頁 4049。

<sup>35</sup> 楊載，〈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公行狀〉，趙孟頫，《松雪齋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元刊本影印），附錄，頁 6b。以下簡稱〈趙孟頫行狀〉。

<sup>36</sup> 宋濂等，《元史》卷二〇五，〈桑哥傳〉，頁 4576。

<sup>37</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閻復傳〉，頁 3772-3774。

<sup>38</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閻復傳〉，頁 3773。

免官一事發生在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左右，《元史·世祖紀》中有更詳細的記載：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丁亥）御史臺月兒魯、崔彧等言：「馮子振、劉道元指陳桑哥同列罪惡，詔令省臺臣及董文用、留夢炎等議。其一言翰林諸臣撰桑哥輔政碑者，廉訪使閻復近已免官，餘請聖裁。」帝曰：「死者勿論，其存者罰不可恕也。」<sup>39</sup>

閻復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左右出任浙西道廉訪使，之前差不多十餘年都供職於翰林院，至元二十三年，陞翰林學士。他與張之翰在翰林院連袂共事過幾年。<sup>40</sup>閻復在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左右因桑哥事件「已免官」，其在翰林時的同僚張之翰在三月被貶，這難道只是一種巧合？張之翰的貶任或許就與桑哥事件有著某種關係。

上引兩份史料都提到閻復是因撰寫桑哥輔政碑而受處分的，該碑是為歌頌桑哥政績而立。關於此碑樹立的前因後果，《元史》紀、傳有載，云：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己亥）大都民史吉等請立桑哥德政碑，從之。

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諛佞之徒，方且諛都民史吉等為桑哥立石頌德，世祖聞之曰：「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於是翰林制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桑哥輔政碑成，樹於省前，樓覆其上而丹雘之。

（二十八年三月己亥朔）仆桑哥輔政碑。<sup>41</sup>

桑哥輔政碑（德政碑）即是將〈王公輔政之碑〉文字上石鐫刻而成的石碑。<sup>42</sup>以

<sup>39</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世祖紀十四〉，頁360。按所載諸人，月兒魯一作月呂魯，名玉昔帖木兒，蒙古阿兒剌氏。《元史》卷一一九有傳（頁2947-2948）。其時為御史大夫。崔彧、董文用，《元史》卷一七三、一四八有傳（頁4038-4046, 3495-3501）。其時分別任御史中丞、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馮子振為南人。留夢炎宋末降元，柯維騏，《宋史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4），卷一八九（頁16上）、曾廉，《元書》卷五五（頁8a-9b）為之立傳，然於入元後事蹟甚略。按張之翰有詩〈壽中齋留學士〉（《西巖集》卷八，頁6a-b），當撰於張任職翰林，留夢炎為翰林學士時。又《元史·世祖紀十四》，至元三十年四月己亥條，記留夢炎職任為翰林學士承旨（頁372）。至元二十九年二月，留夢炎或已為翰林學士承旨。馮子振，《元史》卷一九〇有傳（頁4340），但太過簡略。其事蹟參見王毅，《馮子振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頁32-37。其時當為集賢待制。劉道元事蹟不詳，很可能也是一名南人。

<sup>40</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閻復傳〉，頁3772-3773；張之翰，《西巖集》卷一四，〈送翰林學士閻公浙西道廉訪使序〉，頁8a-9a。

<sup>41</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五，〈世祖紀十二〉，頁317；卷一六，〈世祖紀十三〉，頁345；卷二〇五，〈桑哥傳〉，頁4574-4575。

上史料已經明確指出：（一）「有旨命翰林撰桑哥輔政碑」，碑文是由翰林受命撰寫的，撰寫時間在至元二十六年左右；（二）桑哥倒臺後，曾經撰寫桑哥輔政碑的翰林詞臣受到攻訐與處分；（三）閻復只是「翰林諸臣撰桑哥輔政碑者」之一，撰寫碑文的翰林詞臣不只一人；（四）「復等亦坐是免官」，受此事牽連被追究的也不只閻復一人，還有其他翰林詞臣；（五）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忽必烈對閻復之外曾參與撰寫桑哥輔政碑「翰林諸臣」的「聖裁」是「死者勿論，其存者罰不可恕也」。對牽涉其中的其他翰林詞臣的處罰應是在二月之後。

再來看張之翰的情況。張之翰改任松江知府之前任職於翰林院，前文已述。《西巖集》等多份史料也證明至元二十八年左右他確曾供職翰林。<sup>43</sup>但他進入翰林院的具體時間，則史無明文，對此需要略作討論。《西巖集》卷一二〈沁園春〉中一闕詞前有序，其中云：

至元甲申春，不肖以南臺裏行求去，退居高沙。又二年冬十月，迫以北歸，由維揚至金陵，別行臺諸公。<sup>44</sup>

甲申即至元二十一年。這段敘述即張之翰「以疾謝事，僑居高郵。……臺省交薦，起為戶部郎中」的經歷。<sup>45</sup>至元二十三年十月他北赴大都，開始五年多的京官生涯。其後「陞（戶部——引者注）侍郎，累擢翰林侍講學士」。<sup>46</sup>改任翰林一職時，他曾賦詩一首：

換得新除一紙書，老天又不許安居。才分錢幣離金部，未用篇章動石渠。

吾輩幾時能辦此，斯文一線竟何如？五湖春水三千頃，何處而今無白魚。<sup>47</sup>

<sup>42</sup> 按依碑刻體例，「王公輔政之碑」幾字，似為額題。一般碑中正文題目較長，且詳細。

<sup>43</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九，〈送春九絕〉，頁3a-b，按據「薄官燕都五遇春」，「玉堂有俸清如許」等語，詩當作於至元二十八年春；卷一〇，〈題東坡醉帖二絕〉，頁18a；卷一三，〈夢會圖詩序〉，頁9b，結合前作，可知詩序當作於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前後張之翰任職翰林時；卷一四，〈送翰林學士閻公浙西道廉訪使序〉，頁8a-9a；卷一六，〈種德堂記〉，頁7a，按其中提到「承旨唐公」，即唐仁祖，據《元史》卷一三四，〈唐仁祖傳〉，頁3254載，唐仁祖「二十八年，除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俄除通奉大夫、將作院使」，該記當作於至元二十八年；陳孚，《陳剛中詩集》（收入陶湘，《托跋塵叢刻》〔北京：中國書店，2011〕，據明洪武本影印），卷三，〈偕承旨野莊公學士劉東崖侍講張西巖遊慶壽寺憩僧窗有作〉，頁3b-4a。

<sup>44</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二，〈沁園春〉，頁6a。

<sup>45</sup> 陳棐，嘉靖《廣平府志》卷一二，〈賢行志·鄉賢〉，頁13a。

<sup>46</sup> 陳棐，嘉靖《廣平府志》卷一二，〈賢行志·鄉賢〉，頁13a。

<sup>47</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六，〈和馬性齋韻二首〉，頁14b。

詩作未具年月，所敘應即由戶部侍郎改除翰林一事。《西巖集》卷一〈鄙詩奉餞野齋學士移疾歸東平〉云：

斯文僅如縷，愈久則愈衰。前賢不可作，後生欲奚為。尚賴數名筆，極力相維持。野齋才德高，聞望江河馳。翰林十五載，中外無異詞。近苦步履艱，乞身見文移。……出處固大節，無若此段奇。朝廷更化後，柄用非公誰。行看走蒲輪，其可以疾辭。祖帳東門道，依依重依依。殷勤一卮酒，且作來歲期。<sup>48</sup>

野齋即李謙（字受益，號野齋，東平人）。據《元史·李謙傳》載，李謙長期供職翰林，「（至元）二十六年，以足疾辭歸」，即詩中所謂「近苦步履艱」、「移疾歸東平」。<sup>49</sup> 這首詩應當就撰於至元二十六年。全詩主旨是贊頌李謙的才德，表達依依不捨的送別之情，並期待他重返崗位。這應該是張之翰作為翰林同僚「祖帳東門」的一首詩作。詩句「斯文僅如縷」、「後生欲奚為」，無論用詞，還是語意，都與前一首任職翰林時的詩作尾聯「吾輩幾時能辦此，斯文一線竟何如」相類似。這兩首詩或許作於同一時期，間隔不久。李謙辭任歸鄉，張之翰以同僚情誼相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張之翰很可能是在至元二十六年左右離開戶部，「新除」翰林職任的。

至元二十六年左右進入翰林院的張之翰，完全有可能成為受命撰寫桑哥輔政碑文的「翰林諸臣」之一。如果真的參與其中，在桑哥倒臺後，自然也會和閻復一樣，受到來自其他方面的攻訐和指責。而張之翰的確經歷了這樣的遭遇。《西巖集》卷三收有一首七言古詩，題為〈陳學古談星〉，詩云：

朴翁老矣琴堂死，浙右人稱陳氏子。筆頭移下十二曜，照破群疑惟論理。我生月在斗初度，昌黎東坡略相似。二公聲焰百無一，取謗招讒過之耳。……相逢祇問掛冠年，說有功名恐驚彼。一麾出守今已足，正自將來不須此。太行佳處是西巖，上有白雲下流水。……<sup>50</sup>

詩作主要記載命理占卜之事。由「一麾出守今已足」一句推斷，當撰於張之翰任職松江時。值得注意的是，詩中自稱相比唐韓愈、宋蘇軾，「取謗招讒過之耳」。他於何時曾受人讒謗呢？在元貞元年左右寫給右丞何榮祖的一首詩中，自云：「長記都門送別詞，南來一讀一回思。已離猶自防遭謗，未滿如何敢寄

<sup>48</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鄙詩奉餞野齋學士移疾歸東平〉，頁14a-b。

<sup>49</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李謙傳〉，頁3767。

<sup>50</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三，〈陳學古談星〉，頁12b-13a。

詩。」<sup>51</sup> 其中描述已然離開大都，仍在提防他人誹謗。受人讒謗應是在貶任松江之前、任職大都之時，也即至元二十九年左右。曾經的謗語讒言讓他如此刻骨銘心，難以忘懷。<sup>52</sup>

《西巖集》卷七〈閻學士子靜以詩見寄依韻奉答二首〉云：

閑身無物可遮羅，淡愛青山掃黛蛾。啼（鳥）〔鳥？〕<sup>53</sup> 喚人離憲府，好風吹句下鑾坡。一千八百盡煙景，二十四橋皆月波。天上文星是知己，老于淮海又如何？

一任閒庭雀可羅，豈能求媚畫雙蛾。人情南海與北海，仕路上坡還下坡。

自乏才華依日月，枉將狂直犯風波。世間讒口炎如火，奈此扁舟一葉何。<sup>54</sup> 閻復、張之翰在至元二十三年前素無交往，至元二十三到二十八年，同在大都為官。至元二十六到二十八年間，在翰林院同僚共事。此後，閻復往任浙西，被免官，直到至元三十一年，才重返大都。張之翰則在至元二十九年貶任松江。至元二十八年後二人分處南北，再無共事。<sup>55</sup> 由「一千八百盡煙景，二十四橋皆月波」、「老于淮海又如何」、「人情南海與北海」等句判斷，奉答詩當撰於張之翰貶任松江後。詩中又云「啼鳥喚人離憲府，好風吹句下鑾坡」、「天上文星是知己」。「鑾坡」代指翰林院，詩句描述他收到「文星」知己、曾任翰林學士、此時已「離憲府」閻復的寄詩。閻復至元二十九年初罷任廉訪使後活動於江浙一

<sup>51</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六，〈寄何右丞二首〉，頁 18a-b。關於此詩寫作時間及內容，詳見後文論述。

<sup>52</sup> 張之翰貶任松江後，對曾經遭受到的謗讒耿耿於懷，在詩中屢屢敘及。除了上引言辭外，他還曾云：「無根怨謗嘗求（已）〔己〕」、「怨謗丘山一笑休」。見《西巖集》卷六，〈和劉漕君卿留別韻二首〉（頁 6b）、〈方虛谷見和花朝復用韻〉（頁 15b）。按據其中有云：「今歲雲霄瞻北闕，去年烟雨渡西津。歸心幾逐征鴻發，書破南雲恨未真。」（頁 7a）〈和劉漕君卿留別韻二首〉詩當撰於至元三十年。〈方虛谷見和花朝復用韻〉詩據其中「催科」等語，當撰於張之翰任職松江時，此已為前注 21 揭示。另《西巖集》卷六，〈有寄〉，詩中有云：「動而得謗無非命」，頁 2b。全詩用語、詩意，與〈和劉漕君卿留別韻二首〉相類同，很可能作於同一時期。

<sup>53</sup> 按，「啼鳥」或為「啼烏」之誤，唐·李賀有〈出城〉詩，云：「雪下桂花稀，啼鳥被彈歸」，宋·賀鑄〈品令〉詞，有「閑擁鴛鴦綺，恨啼鳥，喚人起」之語。

<sup>54</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七，〈閻學士子靜以詩見寄依韻奉答二首〉，頁 1a-b。

<sup>55</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閻復傳〉，頁 3773。按據張之翰生平與《元史·閻復傳》載閻復行實，兩人在至元二十三年張之翰入職戶部之前，沒有交集。至元二十三到二十八年，兩人同在大都。參見劉立華，〈元代詞壇上的父子詞人〉，第一章第一節「張之翰生平及詞的創作概述」，頁 6-9。

帶，寄詩與奉答詩當作於這年左右。<sup>56</sup> 張之翰的奉和之作重在以詩言志。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首和詩中「自乏才華依日月，枉將狂直犯風波。世間讒口炎如火，奈此扁舟一葉何」兩句，結合前文的討論，敘說的只能是詩人至元二十九年貶降時曾遭遇的經歷，即曾捲入「風波」，受到「炎如火」的「讒口」攻訐，經歷「人情」冷暖，最終仕路「下坡」，被貶職外放。

如果張之翰確實參與了桑哥輔政碑的撰寫，在桑哥倒臺之後，除會受到攻訐、指責外，和閻復一樣，還會遭遇清算。在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忽必烈作出對撰寫碑文其他翰林詞臣「存者罰不可恕」的批示後，也應是「坐是免官」中的一個。巧合的是，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張之翰就因一場「風波」，「招讒取謗」，遭受攻擊，不得不「倦值」翰林侍講學士的職任，接受貶降外放，成為「謫居江海」的松江知府。這難道又是一種巧合？這絕對不是什麼巧合。只有一種解釋，即前述不是假設而是事實，張之翰是除閻復之外另一個捲入桑哥輔政碑事件的翰林詞臣，並因此受到處罰。而這正是張之翰至元二十九年貶任松江知府的真正原因！

### 三・桑哥輔政碑與翰林諸臣

導致閻復、張之翰捲入政治事件，並因此而遭受免官、貶降處分的桑哥輔政碑，在桑哥倒臺後即被撲倒、毀滅。閻、張二人的文集雖然流傳於世，但卻都並非全帙。<sup>57</sup> 即使完整地流傳下來，想必文集中也不會保留這篇令他們蒙上政治污點的碑文。這是一篇什麼樣的碑文呢？在閻、張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翰林詞臣捲入其中？石碑上的文字，依碑刻體例，一般由撰文、書丹、篆額三部分組成。通常情況下，由三人或兩人負責完成，撰文部分一般由一人來完成。桑哥輔政碑就

<sup>56</sup> 閻復至元二十九、三十年活動於蘇州、杭州一帶，見閻復，〈江浙行中書省新署記〉，周南瑞，《天下同文集》（收入羅振玉，《雪堂叢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卷七，頁34b；閻復，〈平江府報恩萬歲賢首教寺碑〉，錢穀，《吳郡文粹續集》卷二九，〈寺院〉，頁3b-4a。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間，閻復署名官銜為「通議大夫、前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江浙行中書省新署記〉，頁34b）、「通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南西道肅政廉訪使」（〈平江府報恩萬歲賢首教寺碑〉，頁6a），其時他已免官罷職，這應是他自稱或時人（包括建碑人）敬重他的表示。張之翰在詩中仍稱他為「學士」，當是相同用意。

<sup>57</sup> 前文已述，今本張之翰《西巖集》，由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若干而成。閻復文集則久佚，今本《靜軒集》是清末繆荃孫蒐輯而成，收入繆氏《藕香零拾》叢書。

是這樣的一塊碑嗎？如果是這樣，整個事件涉及的可能就是閻復、張之翰兩人。但事實恐怕並非如此。

前引《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忽必烈對捲入桑哥輔政碑撰寫事件翰林諸臣的批示：「死者勿論，其存者罰不可恕也。」已明白昭示還有曾在至元二十六年左右參與撰寫碑文、這時已經卒亡的翰林詞臣捲入其中，只是因為身故而不予追究罷了。捲入該事件的，應不只閻、張二人。如果捲入的還有其他詞臣，那會不會與一般的石碑一樣，最多也就三人而已呢？

就在桑哥輔政碑撰寫前幾年，曾樹立起這樣一通石碑——〈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sup>58</sup> 該碑是釋、道兩家自大蒙古國時期開始不斷鬥爭的產物。至元十八年，忽必烈下令焚毀道藏經書。至元二十一年，命翰林院撰文記其事。碑當樹立於此後不久，至元二十二年左右。<sup>59</sup> 立碑的目的在於昭告天下，以正視聽。在碑名之後、正式碑文之前，列出了撰文、書丹及篆額者的名單：

翰林院臣唐方、楊文郁、王構、趙與魯、李謙、閻復、李濤、李槃、王磐奉敕撰。正奉大夫、樞密副使臣商挺奉敕書。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監修國史臣耶律鑄奉敕篆額。<sup>60</sup>

參與撰寫碑文的翰林詞臣竟然有九人之多，實屬罕見。錢大昕即曾云：「詞臣奉敕撰文，一篇只一人任之，此碑列名者九人，它碑未有其比。」<sup>61</sup> 碑文當是由一人撰寫，其他八人一同署名。這應是為重其事而出現的一個特例，象徵的意義大於實際。<sup>62</sup> 傳詔命翰林諸臣撰寫碑文的即是桑哥，其時任總制院使，兼領功德使

<sup>58</sup> 見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77冊，據元至正刻本影印），卷二一，頁27a-31b。此碑又收於釋祥邁，《大元至元辨偽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77冊，據元刊本影印），卷五，頁1a-6b，文字略同。

<sup>59</sup> 按碑文收錄在紀年乙酉（至元二十二年）條下，撰文上石當在這年完成。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一，頁27a。

<sup>60</sup> 按原文人名多有訛誤、脫落，清人錢大昕據元碑拓片，給予了補正。見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收入《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6冊），卷一八，〈焚毀諸路偽道藏經碑〉，頁487-488。參見党寶海，〈李槃與劉秉忠文集〉，《元史論叢（第十四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頁323注1。又按，這段文字，《大元至元辨偽錄》中作：「翰林院臣唐方、楊文郁、王構、李謙、閻復、李濤、王磐等奉敕撰。」（頁1a）其中人名較清晰、無訛誤，可與《佛祖歷代通載》本相對勘。唯只列翰林院臣七人，缺趙與魯與李槃二人。另缺商挺書丹、耶律鑄篆額一行文字。

<sup>61</sup>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八，〈焚毀諸路偽道藏經碑〉，頁488。

<sup>62</sup> 關於僧道之爭，參見中村淳，〈蒙古時代「道佛爭論」的真相——忽必烈統治中國之道〉，《蒙古學信息》1996.2：1-7；周清澍，〈論少林福裕和佛道之爭〉，《清華元史

司事。具名的翰林詞臣雖多，但碑中行文卻常以時任翰林學士承旨的王磐之名為之。九人列名應是按地位由低到高的次序排列。<sup>63</sup> 碑文當是由地位最高的王磐執筆完成，其他翰林詞臣則參與撰寫，連帶署名。<sup>64</sup>

〈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參與撰寫的翰林詞臣多達九人，前所未有，但卻很可能並非「未有其比」，獨此一例。三、四年之後鄭重其事、同樣受敕命撰文刻石的桑哥輔政碑會不會就是這樣的另外一例呢？桑哥輔政碑是翰林詞臣受命撰寫碑文，碑成後樹立於中樞機構前的一項盛大工程。樹碑的目的也與〈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相近，都是昭示天下，只不過此碑昭示的是桑哥的德政與功績。這是一個好大喜功之舉。忽必烈就說過，「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sup>65</sup> 其規模與形制，應非一般碑刻所能比擬。<sup>66</sup> 元人陶宗儀曾記至元二十七年冬江浙行省為桑哥等人立的德政碑，「穹窿莫比」，甚至於石碑坐石都要用亡宋故家文物來充當。<sup>67</sup> 行省尚且如此，立於中央尚書省前的輔政碑可想而知。桑哥輔政碑在當時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和影響程度，決不亞於〈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只會在其之上。碑文的撰寫，應該也超出常規，並非只由一人擔當。曾親身經歷〈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撰文刻碑過程的桑哥，也完全有可能採取或接受同樣的方式，崇隆其事。<sup>68</sup> 由多名翰林詞臣列名撰寫碑

---

（第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38-73。

<sup>63</sup> 參見党寶海，〈李槃與劉秉忠文集〉，頁 323。

<sup>64</sup> 翰林院官屬有共同參與撰寫文字的慣例。袁桷，〈清容居士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元刊本影印），卷二七，〈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永國公謚文康間公神道碑銘〉載：「故事，表箋自待制而下分撰，公（按指間復）命各為一通，輯其精良，融為一家。」（頁 10b）以下簡稱〈間復神道碑銘〉。王磐和翰林諸臣聯名撰寫〈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的情況，當與此類似。

<sup>65</sup> 宋濂等，〈元史〉卷二〇五，〈桑哥傳〉，頁 4574。

<sup>66</sup> 至大年間，姚燧在為達失蠻撰寫的神道碑銘中，曾提及忽必烈時期遺留下來，準備為阿合馬褒揚功德的石碑。姚燧，〈牧庵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1 冊），卷一三，〈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銘并序〉：「『昔盜殺大臣嘗求王文忠公褒揚其功，文忠不可，其碑故存，請發兵士如千百人挽之。』制曰：『無庸，其令十象輦致。』」（頁 8b）按「盜殺大臣」即阿合馬，「王文忠公」即王磐。石碑需「千百人」，或「十象」才能「挽之」、「輦致」，其規模、形制之巨，可以想見。為桑哥歌功頌德的石碑，其規模與形制，當不在阿合馬石碑之下。王磐拒為阿合馬撰碑一事，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王磐傳〉有載。（頁 3755）

<sup>67</sup>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三，〈爐鳴〉，頁 278。

<sup>68</sup> 桑哥喜於表功，對這種贊頌自己的方式，不僅樂見，還有可能主動安排。他就曾主動要求過董文用，讓董在忽必烈面前贊頌其功績，見虞集，〈道園學古錄〉（收入《四部叢刊初



文，贊頌「勢燄薰天」<sup>69</sup>的桑哥，「使其喜」，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只不過至元二十二年的碑文因佛家經典記載保留至今，而桑哥輔政碑卻因人亡碑毀不存於世，參與撰寫的翰林詞臣諱言其事，有意抹滅，不為後世所知罷了。即如捲入其中的閻復，元人袁桷在為他撰寫的神道碑銘中，就為尊者諱，於其為桑哥撰碑事，完全迴避，不著一言。<sup>70</sup>若非當時《實錄》記載，以及明初修史者據此作傳，後世治史者也一定不會知道閻復曾有過這樣一段經歷。<sup>71</sup>閻復應該就是輔政碑文的執筆者，而張之翰等其他翰林詞臣則參與撰寫，列名其中。<sup>72</sup>

同時，正因為有眾多翰林詞臣列名參與撰寫輔政碑文，為桑哥歌功頌德，其倒臺之後，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他們很自然地成為眾矢之的。由此受到馮子振、劉道元等人的指責、攻擊，省、臺和當時翰林國史院的主管董文用、留夢炎才會共同會議其事，御史臺高官稟奏，提請「聖裁」，並被鄭重其事地載入《實錄》。不然，如果僅僅牽涉閻復、張之翰等兩、三人，如此大動干戈，反而顯得突兀，不好理解了。

桑哥輔政碑事件曾令當時眾多翰林院詞臣牽涉其中，並受到清算，其實還有蛛絲馬跡，可從追尋。《元史·世祖紀》載：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壬寅，御史大夫月兒魯等奏：「比監察御史商琥舉昔任詞垣風憲，時望所屬而在外者，如胡祇適、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凝、程文海、陳儼、趙居信十人，宜召置翰林，備顧問。」帝曰：「朕未深知，俟召至以聞。」<sup>73</sup>

此事記在這年二月忽必烈批示對捲入桑哥事件的翰林諸臣進行處罰，閻復已被免

---

編》，據明景泰翻元小字本影印），卷二〇，〈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桑葛令人風公贊已功於上前」，頁11b。

<sup>69</sup> 蘇天爵編，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四，〈平章魯國文貞公〉，引姚燧撰〈不忽木神道碑〉，頁63。

<sup>70</sup> 見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七，〈閻復神道碑銘〉，頁9b-14b。

<sup>71</sup> 明初修元順帝之前諸帝本紀，多本自元朝遺留下來的十三朝《實錄》。參見陳高華，〈《元史》纂修考〉，《歷史研究》1990.4：125。

<sup>72</sup> 參見前注64。

<sup>73</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世祖紀十四〉，頁361。其中「高凝」作「高道」，據《元史》本卷後附校勘記四改，頁377。參見危素，〈大元敕賜故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程公神道碑銘〉，程鉅夫，《程雪樓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據清宣統二年陶氏覆刻明洪武本影印），附錄，頁9b。

官，張之翰剛被貶降之後。<sup>74</sup> 監察御史商琥的舉薦、御史大夫月兒魯的上奏，決非偶然。更應注意的是，奏事中涉及的十人，是「宜召置翰林」。也就是說，奏請讓這十人前往翰林院任職。這份上奏的內容極不尋常。元代翰林院有翰林國史院與蒙古翰林院之分，商琥舉薦十人任職的是前者。而這十人都是「時望所屬而在外者」，到翰林院也是任職直學士以上院官的職務。<sup>75</sup> 據《元史·百官志》載，忽必烈時期，翰林直學士以上員額最多不過十九人。<sup>76</sup> 其時舉薦十人任職其中，佔了翰林官員一半以上的比例。這種現象前所未有。在翰林院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如此眾多的官員更迭。<sup>77</sup> 如果不是發生重大變故，出現較大的員額空缺，

<sup>74</sup> 按，壬寅為初十日，見洪金富編，《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頁 394。張之翰在至元二十九年三月清明（當在十六日前後）左右啓程赴任松江。他之被貶，當在三月清明之前。

<sup>75</sup> 元代翰林院官中，地位最高者為翰林學士承旨，以下依次為翰林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和翰林直學士。宋濂等，《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頁 2190。參見張帆，〈元代翰林國史院與漢族儒士〉，《北京大學學報》1988.5：75。被薦十人，胡、姚、王、雷、陳（天祥）、楊、程七人，《元史》有傳。據本傳，這七人在至元二十九年以前，均或在「詞垣」任過直學士以上，或在「風憲」任過從四品以上的官職。翰林直學士職品從四，陳高華、張帆等，《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官制一·職品·內外文武職品〉，頁 199。此次被薦，當然只會任翰林直學士以上院官的職務。其餘三人，高凝至元二十五年曾任正五品的南臺治書侍御史（見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官守志·題名〉，頁 273），此時若入翰林，也當會是直學士以上。陳儼至元二十九年應召後當任為學士職，張伯淳曾有〈壽陳北山學士〉詩，見氏著，《養蒙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卷九。按據詩意及《元史》卷一七八〈張伯淳傳〉（頁 4147）載其行實，詩當作於至元二十九年左右張任翰林直學士期間。趙居信至元二十九年曾應召赴都，但任職不詳，見王惲，《秋澗集》卷二一，〈朝謁柳林行宮二詩〉，頁 16b。依據上述九人的情況，他若入翰林，當也是直學士以上。

<sup>76</sup> 宋濂等，《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頁 2189-2190。此數字是據文字前後記載相加而得，很可能並非翰林國史院常有的院官數額。一般情況下的實際名額應當小於本文的統計數字，不到十九人。

<sup>77</sup> 據元人王惲記載，中統二年翰林國史院成立時，已任、擬任的翰林官屬也只王鶚、郝經、李昶、李治、王磐五人，見王惲，《秋澗集》卷八二，〈中堂事記下〉，頁 11a。元代史料中記載了兩次多人被舉薦進入翰林的事例。一是中統初年翰林國史院初立時，王鶚曾「舉李治及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單公履、郝經、高鳴為學士，楊恕、孟攀麟為待制，王惲、雷膺為修撰，周砥、胡祇遹、孟祺、閻復、劉元為應奉。凡前金遺老，及當時鴻儒，搜抉殆盡」。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內翰王文康公〉，引李愷撰《王鶚言行錄》，頁 239。按其中所記十八人應是王鶚先後所舉，並非翰林院初立時即任職其中。如閻復，遲至至元八年才入職翰林。直學士以上官不過八人。二是至元十年，王磐「舉宋衡、雷膺、魏初、徐琰、胡祇遹、孟祺、李謙宜居翰苑」。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內翰王文忠公〉，引李謙撰《王磐墓誌》，頁 244。

決不會有這樣多達十人的薦舉與上奏。重大變故，結合前文對張之翰、桑哥事件的討論，相信大家都會同意，那就是翰林諸臣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近十餘人）捲入桑哥輔政碑撰寫事件而被免官去職。不然，這樣的推薦也就毫無意義。

至元二十九年因桑哥事件受到牽連和清算的翰林諸臣，除閻、張之外，還有哪些，因史料乏載，不能確知。也沒有一份至元二十六到二十九年間翰林院任職官員的名單可供利用。上引〈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列名至元二十二年的九名翰林詞臣，承旨王磐這年致仕。<sup>78</sup> 王構至元二十二年左右當任翰林修撰，後離開翰林院，二十六年前後當在憲臺。<sup>79</sup> 兩人應可排除在外。趙與愚至元二十二年任翰林侍講學士，三十一年左右改侍讀學士。<sup>80</sup> 這期間一直供職於翰林院，有參與輔政碑文撰寫的可能，但他似乎未受到桑哥事件的牽連。<sup>81</sup> 唐方為南人，至元二十四年初已陞為翰林待制。<sup>82</sup> 楊文郁至元二十六年的事蹟不詳。李謙至元二十二年左右當為翰林侍讀學士，至元二十六年辭職歸家。<sup>83</sup> 李濤、李槃早有聲名，碑列名單中，兩人僅次於翰林學士承旨王磐。<sup>84</sup> 兩人其時應已近垂

<sup>78</sup>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內翰王文忠公〉，引李謙撰〈王磐墓誌〉，頁246。

<sup>79</sup> 據袁桷，〈翰林承旨王公墓誌銘〉，載王構在翰林升遷次序，「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由院中敘遷應奉、修撰，升侍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蘇天爵編，《國朝文類》（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元至正二年杭州路西湖書院刊本影印），卷五二，頁22b。又據宋濂等，《元史》卷一六四，〈王構傳〉，其升侍講，是在至元二十八年後。（頁3856）王構至元二十二年左右，當任為翰林修撰。

<sup>80</sup> 據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二，〈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趙公行狀〉載，趙與愚至元十九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後任該職十四年。（頁3a）又據王惲，〈德壽殿玉池方硯〉，詩後小注云：「當時同僚承旨留中齋、學士劉東崖、侍讀趙方塘，皆宋人也。」詩作於至元三十一年左右。王惲至元二十九年應召入翰林，劉岳（號東崖）至元三十一年以翰林學士出為建昌路總管。見張伯淳，《養蒙文集》卷二，〈送劉東崖赴建昌總管序〉。其時趙與愚（號方塘）已為翰林侍讀學士，〈行狀〉及《元史·趙與愚傳》均失載。宋濂等，《元史》卷一六八，頁3959-3960。

<sup>81</sup> 趙與愚至元二十八年初曾上言指責桑哥專權，後得忽必烈嘉賞。見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二，〈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趙公行狀〉，頁3b-4a；宋濂等，《元史》卷一六八，〈趙與愚傳〉，頁3959-3960。

<sup>82</sup> 王士點、商企翁編，高榮盛點校，《秘書監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卷一，〈職制·設官〉，頁24。

<sup>83</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李謙傳〉，頁3767。

<sup>84</sup>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高凝撰〈廉希憲家傳〉，頁127；卷一〇，〈宣慰張公〉，引王惲撰〈張德輝行狀〉，頁207。

暮，李濤在至元二十六年的事蹟不詳，李槃則有資料顯示曾任翰林學士，<sup>85</sup>後致仕還鄉，<sup>86</sup>至元二十八到三十一年之間亡故。<sup>87</sup>唐方、楊文郁、李謙、李濤、李槃五人，也都有捲入桑哥輔政碑事件的可能。<sup>88</sup>忽必烈至元二十九年二月所稱的「死者勿論」，死者或許即是李槃。<sup>89</sup>此外，有資料顯示，至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間，在翰林院供職的還有李天英、王之綱，分別擔任直學士、待制的職務。<sup>90</sup>兩人與桑哥輔政碑事件有否關聯，囿於史料缺乏，尚不得而知。

前引〈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所列九名翰林詞臣只是負責碑文撰寫，書丹及篆額者分別是時任樞密副使的商挺與中書左丞相耶律鑄。桑哥輔政碑書丹

<sup>85</sup> 孟繁清先生曾撰文懷疑李槃任翰林直學士後一直沒有陞遷，並沒有擔任過翰林學士一職，見氏著，〈韋軒李公考〉，《中華文史論叢》2012.4：354-355。其說有誤，原因有三：一是至元十五年左右，李槃已陞任為翰林侍講學士（王惲著，楊曉春點校，《玉堂嘉話》〔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三，〈望拜行在禮儀〉記：「至元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講德新（按槃字德新）、應奉李謙，陪百官就位，望拜行在所。」〔頁86〕）；二是〈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所列至元二十二年左右翰林院臣名單，前文已經論述，九人列名應是按地位由低到高的次序排列。李槃在其中僅次於承旨王磐。其時排列李槃之前的趙與峘、閻復已任翰林侍講。李槃職務不可能是低於侍講的翰林直學士；三是姚燧曾稱：「今日燧直翰林，視槃翰長為同事、同階、同時而同治者。」姚燧，《牧庵集》卷二八，〈中奉大夫湖北道宣慰使趙公墓誌銘〉，頁8a。文撰於至元三十一年左右，其時姚燧任翰林學士，見劉致，〈姚燧年譜〉，頁12b-13a。所謂「同階」，應指李槃也曾任為翰林學士。參見党寶海，〈李槃與劉秉忠文集〉，頁322。

<sup>86</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三，〈送周學士致政南歸〉，頁5a。參見党寶海，〈李槃與劉秉忠文集〉，頁323。這首詩應撰於張之翰尚未貶任松江之前。

<sup>87</sup> 參見党寶海，〈李槃與劉秉忠文集〉，頁323。按據張之翰至元二十八年夏撰文云：「其家世事業，見於內翰李韋軒先生所作神道碑，茲不復云。」見氏著，《西巖集》卷一五，〈樂善堂記〉，頁11b。文中稱李槃（號韋軒）不作「故內翰」，李槃卒年或在至元二十八年夏之後。

<sup>88</sup> 前引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商琥舉薦「時望所屬而在外者」多人任職翰林，其中並沒有至元二十六年辭職歸家的李謙。依李謙宿望、資格，完全符合推薦標準。他之重返翰林，是在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之後。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李謙傳〉，頁3767。這也旁證李謙或許捲入了桑哥輔政碑事件，故而未被列入舉薦名單。

<sup>89</sup> 如果此時李槃還健在，並沒有捲入桑哥輔政碑事件，致仕還鄉的他也完全符合商琥的舉薦標準。

<sup>90</sup> 見宋濂等，《元史》卷一五，〈世祖紀十二〉，至元二十六年正月戊申條，頁319；鄭麟趾，《高麗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第159冊，據明景泰二年朝鮮活字本影印），卷三〇，〈忠烈王世家三〉，忠烈王十五年（1289）二月丙寅，頁16b；閻復，〈藏春詩集序〉，劉秉忠，《藏春詩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1冊，據明刻本影印），前附，頁1b；王惲，《秋潤集》卷五七，〈大元國大都創建天慶寺碑銘并序〉，頁4a。按據內容，碑銘當作於至元二十六年左右。

和篆額的名單已不可考。有學者認為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外調為濟南路同知的趙孟頫，似乎也頗受桑哥理財事件的牽連。<sup>91</sup> 身為書法名家的趙孟頫，或許就是石碑的書丹者。

#### 四・政治清算與桑哥輔政碑事件

眾多翰林詞臣參與撰寫碑文，是一件極為罕見的事情。而「以文字為職」<sup>92</sup> 奉旨撰文的翰林詞臣又因文字得罪，<sup>93</sup> 集體遭受清算，被免官去職，則是一件更為罕見的事情。翰林官屬奉制、敕撰寫碑文，代天子立言，<sup>94</sup> 是他們的主要職責之一，<sup>95</sup> 主要是宣示皇帝、朝廷官方的意見與態度，通常並不代表他們個人的觀點和傾向。元代前期的著名文士李冶曾評價翰林官屬的職任：

特書佐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非是是也。<sup>96</sup>

即如前述至元二十一年撰寫〈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的王磐等人，撰文指斥道教，更多只是受命代表朝廷，完成指令的職務行為。他們個人對道教則並不排斥。王磐、李槃、閻復、李謙等人與道教都有所連繫，與一些道教領袖也都有著良好的私人關係。<sup>97</sup> 至元二十六年左右，閻復、張之翰等翰林諸臣撰寫桑哥輔

<sup>91</sup> 見陳爽，〈忽必烈時期南方士大夫政治地位的浮沉〉（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25。

<sup>92</sup> 馬祖常，〈馬石田文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據明刊本影印），卷八，〈上都翰林分院記〉，頁15b。

<sup>93</sup> 翰林詞臣得罪受懲的表面原因，是撰寫碑文時「引論失當」。見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世祖紀十四〉〉，頁362。關於這條史料，詳見後文論述。

<sup>94</sup> 劉仁本，〈《羽庭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6冊），卷五，〈送台州儒學教授陳子章之任序〉，頁39b。

<sup>95</sup> 參見張帆，〈元代翰林國史院與漢族儒士〉，頁76。

<sup>96</sup>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三，〈內翰李文正公〉〉，引李冶撰〈敬齋泛說〉，頁263。

<sup>97</sup> 這些翰林諸臣在至元二十一年撰〈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之前、之後，與道教徒（有的甚至是在佛、道之爭中失敗、遭受斥責的人）頗有往來，屢屢為道教宮觀、道教領袖撰寫碑銘文字（其中也不乏奉旨撰寫之作）。見王磐，〈元創建昭應宮碑〉、〈創建真常觀記〉、〈玄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銘〉，陳垣編，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1101-1102, 615-616, 660-661；李槃，〈靖應真人碑〉，陳垣，〈《道家金石略》〉，頁1120-1121；閻復，〈玄都萬壽宮碑〉，陳垣，〈《道家金石略》〉，頁656；李謙，〈弘玄真人趙公道行碑〉、〈玄門掌教大宗師存神應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陳垣，〈《道家金石略》〉，頁699-702；王惲，〈《秋澗集》卷四

政碑的情況，應也與此類似。奉旨撰寫的碑文內容並不反映他們個人的政治立場和觀點，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是桑哥本人及其理財活動的支持和擁護者。桑哥輔政碑先是經地方百姓請求樹立，然後由忽必烈下令翰林院撰寫碑文。整個過程，翰林諸臣都不是主動的參與者。碑文的主旨與內容已然確定，翰林諸臣更多的只是奉旨撰文，履行職責，與他們的個人立場和觀點沒有多大關係。然而，當桑哥倒臺之後，他們卻因此事得罪受懲。單純從事件本身看，桑哥輔政碑事件就是發生在號稱「度量弘廣」、「信用儒術」的忽必烈統治時期的一起文字之禍。<sup>98</sup> 因文得禍，這種情況不僅極為罕見，甚至在整個元朝歷史上，也可以說是絕無僅有，「未有其比」。<sup>99</sup> 事實上，考察至元二十九年左右閭復、張之翰等翰林諸臣的這種遭際，須從當時乃至整個至元後期的政治形勢中去尋找緣由。

首先，桑哥輔政碑事件是桑哥倒臺後政治清算擴大化的產物。翰林諸臣因文字得罪，遭受處罰，直接原因就在於桑哥理財活動失敗後的政治清算。蒙元前期政治史上，在殘酷而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一方，常會面臨、遭受到無情的打擊和清算，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並不罕見。一二五〇年代，蒙哥汗繼立後，對反對的窩闊台系諸王、貴族大肆殺戮。一二六〇年前後，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失敗方阿里不哥陣營中的貴族親信，幾被悉數清除。一二七〇年代阿合馬專權和一二八〇年代初盧世榮執政時期，反對理財政治的官僚與理財權臣之間政爭激烈，張易、崔斌、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史彬等顯赫政壇的官僚重臣，都遭遇打擊或清算，身死名裂。這些都是治元史者熟悉的史實，無需贅言。<sup>100</sup>

---

○，〈真常觀記〉，頁 15b。參見周清澍，〈論少林福裕和佛道之爭〉，頁 66-67。

<sup>98</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世祖紀十四〉，頁 377。

<sup>99</sup> 除本文探討的桑哥輔政碑事件之外，在元朝統治時期，還並無第二例以文字得罪遭受迫害的案例。阿合馬專權時期，翰林院也曾為其歌功頌德，但未見有人因此受到處罰，見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崔彧傳〉，至元二十年，彧上言「翰苑亦頌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頁 4039）即使如元文宗時曾受命撰文誣指妥懽帖睦爾（按即後來的順帝）非元明宗之子的虞集，在順帝即位後，也並未因此受到清算。在受到攻訐時，順帝云：「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頗不以為意。虞集之事見《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頁 4180-4181。

<sup>100</sup> 參見陸峻嶺、何高濟，〈從窩闊台到蒙哥的蒙古宮廷鬥爭〉，《元史論叢（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44-45；劉迎勝，〈蒙哥即位風波中的察合台、窩闊台系諸王〉，《內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韓儒林先生紀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 89-96；李軍，〈資兼文武三晉英豪——崔斌其人及其詩〉，《山西大學學

作為忽必烈統治時期理財政治的繼續和發展，圍繞桑哥理財而展開的政治鬥爭，也不例外，同樣充滿了對政治對手的殘酷打擊和清算。桑哥專權時期，誣殺中書參政楊居寬、郭佑等人，直接從肉體上消滅政治反對者，其「貪暴殘忍，又十倍於阿合馬」。<sup>101</sup> 待到桑哥倒臺，他及黨羽旋即遭受昔日政治對手的打擊和清算。除桑哥本人被處死外，一些人「恣為不法」，被明確定為桑哥的「黨與」。如唆羅兀思、要束木、八吉由、忻都等人。<sup>102</sup> 這些「黨與」除極個別人外，都被誅殺。與此同時，一些與桑哥關係密切、參與理財政治較深、與桑哥理財擺脫不了干係、在桑哥專政時期任職於尚書省的高級官僚，雖沒被認為「黨與」，但卻因與桑哥位屬「同列」，也被納入打擊、清算的範圍。如原尚書右丞、南人葉李，「會桑哥敗，事頗連及同列」，三月左右，「獨以疾得請南還」。<sup>103</sup> 所謂「以疾」南還，不過是政治失勢的一種託辭而已。原尚書平章政事、蒙古勳貴帖木兒「以同官坐罷」，另一位尚書平章政事、色目貴族阿魯渾薩理則被罷職、抄家。<sup>104</sup> 在這年五月「罷尚書省事皆入中書」的中樞改組中，原桑哥理財時期任職

報》2005.1：90-92；毛海明、張帆，〈史彬事迹鉤沉〉，《中國史研究》2014.1：134-142。

<sup>101</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傳〉，頁3168；卷二〇五，〈桑哥傳〉，頁4571；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二，〈數讖〉，頁272。

<sup>102</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頁344, 347, 352；卷一七，〈世祖紀十四〉，頁359-360；卷二〇五，〈桑哥傳〉，頁4576。

<sup>103</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葉李傳〉，頁4049。按，本傳不載葉李「得請南還」的具體時間，但據記事在李淦上書之前，及《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載至元二十八年四月庚寅，「以鈔法故，召葉李還京師」（頁346），又載七月戊申李淦上言（頁349），推斷葉李「南還」當在這年三月左右。

<sup>104</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三〇，〈阿魯渾薩理傳〉，頁3176；屠寄，《蒙兀兒史記》（北京：中國書店，1984），卷九一，〈也速孃兒傳〉，頁7b；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七，〈大元勅賜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文定全公神道碑銘〉，頁14b；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元刊本影印），卷二四，〈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道碑〉，頁10a-11a。按，《元史·阿魯渾薩理傳》及趙孟頫所撰碑銘，對阿魯渾薩理捲入桑哥理財受到清算的事實，多有迴護不實之處，此節已為屠寄揭示，見氏著，《蒙兀兒史記》卷一一八，〈阿魯渾薩理傳〉，頁728。黃潛所撰帖木兒神道碑文，也多有曲筆。屠寄雖有所發明（屠氏當有所本），云：「也速孃兒（按即帖木兒）亦以同官坐罷，責其言之不早也。」但也未能盡得其實。按據《元史》記載，帖木兒在尚書省中位高權重，與桑哥關係密切。見《元史》卷一四，〈世祖紀十一〉，頁296, 301；卷二〇五，〈桑哥傳〉，頁4571-4572。他被罷職，當因捲入過深，並非僅是「言之不早」。

尚書省的宰執，被保留職務仍居中樞的，只有左丞馬紹、參政高翥二人。<sup>105</sup> 馬紹因「忠潔可尚」，故而「復舊職」，未受牽連。<sup>106</sup> 高翥大約也是如此。然而在這年底，高翥也離開了中書省，被放外任。<sup>107</sup> 這樣的遷調，應該也是受到追究與清算的結果。

政治鬥爭的殘酷性，不僅在於政治上乃至肉體上，對政敵實施毀滅性的打擊，還在於這種政治打擊與清算的擴大化，波及一些與政敵曾有著某種程度合作、或者立場並不鮮明的官僚成員，使這部分人也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蒙哥汗對窩闊台系諸王、貴族清洗時，與窩闊台家族關係密切，人身隸屬關係上依附窩闊台家族的耶律鑄受到牽連，險被處死。<sup>108</sup> 至元三年，任職中書省的王惲捲入王文統事件，也幾乎喪命。<sup>109</sup> 至元十九年，在清算阿合馬理財集團罪惡時，時任御史中丞的崔彧就上言：

阿合馬當國時，同列皆知其惡，無一人誰何之者；及既誅，乃各自以為潔，誠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合馬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為守門卒隸，亦不可留。……<sup>110</sup>

對此，忽必烈的答覆是：「已敕中書，凡阿合馬所用，皆罷之，窮治黨與，纖悉無遺。……」<sup>111</sup> 既然連「守門卒隸，亦不可留」，政治清算的擴大化當然也就在所難免。

至元二十九年翰林諸臣的遭遇，無疑也是政治清算擴大化的結果。翰林院既非理財機構，也非握有實權的重要部門。翰林諸臣「以文字為職」，也不是什麼顯宦重臣，與上述那些在理財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桑哥「黨與」、「同列」相比，無論在地位還是影響上，都有著顯著差別。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他們也沒有參與理財政治的實際活動，但是在追究政治責任時，卻被納入「桑哥同列」而

<sup>105</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頁347。按，高翥其人，《元史》無傳，〈宰相年表〉不列其人，見《元史》卷一一二，頁2802-2803。據研究，高翥字飛卿，陝西奉元人，至元二十四至二十八年間，曾任為尚書省參知政事。參見毛海明，〈北方漢族士人官僚與元代前期政治〉（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頁181-184。

<sup>106</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馬紹傳〉，頁4054。

<sup>107</sup> 王惲，《秋潤集》卷二一，〈送參政飛卿時改遷西省〉，頁9a-b。

<sup>108</sup> 參見陳得芝，〈耶律鑄生平中被掩蓋的一段經歷〉，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464-467。

<sup>109</sup> 參見蔡春娟，〈李壇、王文統事件前後的王惲〉，《中國史研究》2007.3：105-110。

<sup>110</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崔彧傳〉，頁4039。

<sup>111</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崔彧傳〉，頁4039。



遭到打擊、清算。在此需要重複引用前引《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九年二月的一條記載：

御史臺月兒魯、崔彧等言：「馮子振、劉道元指陳桑哥同列罪惡，詔令省臺臣及董文用、留夢炎等議。其言：翰林諸臣撰桑哥輔政碑者，……」

翰林諸臣不僅被視為桑哥的「同列」，撰寫輔政碑的行為更被貼上「桑哥同列罪惡」的標籤。政治清算擴大化，就是閹復、張之翰等人遭受攻訐、懲處，被免職貶官的最直接原因。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曾撰寫碑文頌揚桑哥的翰林諸臣遭遇「池魚之殃」，受到政治敵對者的攻訐，成為政治清算擴大化的對象，並不奇怪。

那麼，究竟是哪些桑哥昔日的政治對手在桑哥輔政碑事件上發揮作用，主導了對翰林諸臣政治清算的擴大化呢？馮子振、劉道元固然是直接的攻訐者，但如無當時政治舞臺上佔據主要地位中樞官僚的支持，這樣針對「皆極天下之選」<sup>112</sup>翰林官僚群體的攻訐，很難取得成功。當然，忽必烈的態度也是關鍵性因素之一（關於這點，詳見後文論述）。在當時政治舞臺上佔據主要地位的，大都是反對桑哥理財，在桑哥專權時期曾遭受打壓的政治對手。同時他們也是扳倒桑哥的主要力量。扳倒桑哥的政治力量，據《元史》等漢文史料，主要是色目貴族不忽木、也里審班、也先帖木兒，蒙古勳貴月赤察兒、徹里，漢人賀勝等人。<sup>113</sup> 據波斯文史料《史集》，則是色目人木八剌沙。<sup>114</sup> 據藏文史料《漢藏史集》所載，則為怯薛長月呂魯等蒙古勳貴。<sup>115</sup> 大概是各史料的編纂者交往熟悉的人群及信息來源不同，故而各有側重，要之各得其實，共同組成歷史的真相。總的說來，桑哥昔日的政治對手，反對其理財的，大致包括兩類人：一類是利益遭受損害的蒙古、色目權貴；一類是所謂漢法派，包括深受儒家正統思想影響漢化較深的蒙古、色目官僚及部分漢人高級官僚。當然，這兩類人有一定的重合，或者有著某種程度的

<sup>112</sup> 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舊鈔本影印），卷七，〈上李秦公書〉，頁3b。

<sup>113</sup> 宋濂等，《元史》卷二〇五，〈桑哥傳〉，頁4575；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七，〈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康里公碑〉，頁17b，以下簡稱〈不忽木碑〉；元明善，〈太師淇陽忠武王碑〉，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二三，頁11b；姚燧，〈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五九，頁21b-22a；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一三，〈賀丞相神道碑〉，頁5b。

<sup>114</sup> 刺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七章〈忽必烈合罕紀·紀異密阿合馬之後充合罕維昔兒之畏吾兒人桑哥及其結局〉，頁365。

<sup>115</sup> 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上篇二四，〈桑哥丞相的故事〉，頁182-184。

政治交集和連繫。這些人成為至元後期政治舞臺上的主要力量，主持和開展了對桑哥理財時期任職官僚的政治打擊和清算。相關史料記載，在對桑哥「黨與」要束木、納速剌丁滅里、忻都等人的清算中，月呂魯、徹里、不忽木等蒙古、色目權貴發揮了直接而重要的作用。<sup>116</sup> 當時任職於中樞的麥朮丁、崔彧等人，也應是政治清算主要的主持與實施者。<sup>117</sup>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當時的中樞官僚都是由反對理財政治的桑哥的政治對手組成，但他們的政見並不完全一致，他們之間也存在著政爭和衝突。<sup>118</sup> 同樣，他們雖然都主張對桑哥事件進行政治清算，但對清算的程度和範圍，也應該存在著不同意見。

現存所見元代史料中，都沒有具體記錄當時有哪些中樞官僚主張或者支持，就桑哥輔政碑事件對翰林諸臣展開政治清算。然而可以根據若干線索作一番考察。《西巖集》中收有多首元貞元元左右，貶任松江的張之翰寫給當時任職中書、行省高級官僚的寄詩或者唱和之作，這些高級官僚包括不忽木、何榮祖、馬紹、徐琰等人。<sup>119</sup> 除徐琰外，其餘三人在至元二十八年左右都任職於中樞，分別擔任平章、右丞、左丞的職務。對包括張之翰在內翰林諸臣的政治清算，應該不是由他們三人主持，或者出自於他們的主張。否則，張之翰不可能還在詩中希求他們施加援手，改變自身境遇。

至元二十八年左右的中樞官僚中，崔彧有著最大的嫌疑。早在十年前的阿合馬事件中，作為政治清算擴大化的積極主張者，當時就曾建言追究翰林官僚的「罪錯」。至元十九年，他建議「守門卒隸，亦不可留」，這在前面已經引及。其時他還奏請獲准對阿合馬遇刺事件中同時被殺的尚書左丞郝禎「剖棺戮屍」，對

---

<sup>116</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世祖紀十四〉，頁 359-361；卷一三〇，〈不忽木傳〉，頁 3169；刺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七章〈忽必烈合罕紀·紀異密阿合馬之後充合罕維昔兒之畏吾兒人桑哥及其結局〉，頁 366；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七，〈不忽木碑〉，頁 18a；姚燧，〈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五九，頁 22a-b。

<sup>117</sup> 按桑哥倒臺之初，二人就上言要求清算桑哥黨羽，見宋濂等，《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頁 347；卷一七三，〈崔彧傳〉，頁 4041-4042。

<sup>118</sup> 如完澤與不忽木「有隙」，不忽木曾因政事斥責崔彧、麥朮丁。見宋濂等，《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傳〉，頁 3169, 3171；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七，〈不忽木碑〉，頁 19b。其中與不忽木「有隙」的「丞相」，即是完澤。

<sup>119</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六，〈寄徐容齋參政馬性齋右丞〉、〈寄何右丞二首〉、〈寄呈卜平章〉，頁 16a-b, 18a-19b。

死去的人也不放過清算。<sup>120</sup> 他大概是一個性格剛狠的人。至元二十年，時任刑部尚書的崔彧上疏「言時政十八事」，其中有：

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在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sup>121</sup>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要求「問罪」臺臣，「屏除」餘黨外，他還提出「翰苑」官僚「亦頌阿合馬功德」的過錯。雖然未明言要求「問罪」或者「屏除」，但建議「博訪」、「以重此選」，其目的就是要淘汰掉這些翰林官僚。這個建議當時很可能並沒有「議行」，<sup>122</sup> 因為並未見有翰林官僚因此而受到處分。但崔彧的這個舉動，很容易讓人將其與九年後翰林諸臣由於撰寫輔政碑歌頌桑哥功德而受到清算的事件相連繫。九年之前攻訐翰林官僚的始作俑者，完全有可能成為九年之後清算翰林諸臣的主要推手。

這樣的連繫並非沒有道理，因為在桑哥輔政碑事件發生前後，崔彧就曾攻訐一名詞林文學之士。《元史·崔彧傳》載：

（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又奏：「江西詹玉，始以妖術致位集賢。當桑哥持國，遣其掎核江西學糧，貪酷暴橫，學校大廢。近與臣言：撒里蠻、答失蠻傳旨，以江南有謀叛者，俾乘傳往鞠；明日，訪知為禿速忽、香山欺罔奏遣。玉在京師，猶敢誑誕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嘗知之。其亟禽以來。」<sup>123</sup>

南人詹玉其時應為集賢學士。崔彧的攻訐集中在兩點：一是桑哥黨羽，「助紂為虐」；二是假傳聖旨，「欺罔」、「誑誕」。攻訐只是一面之辭，或有誇大事實的成分。詹玉被元人視為「名儒」，頗有文名，與名流雅士多有交往。<sup>124</sup> 他與張

<sup>120</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崔彧傳〉，頁4039。

<sup>121</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崔彧傳〉，頁4039-4040。

<sup>122</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崔彧傳〉，頁4041。

<sup>123</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崔彧傳〉，頁4045。

<sup>124</sup> 按詹玉字可大，號天遊。元人編《名儒草堂詩餘》，收錄有他多闕詞作。他與劉壎、陳宜甫、楊鎮等人，多有來往。見元鳳林書院輯，《精選名儒草堂詩餘》（元刻本），卷上，〈天遊詹玉可大〉，頁8a-11b；陶宗儀纂，《說郛》（北京：中國書店，1986，據涵芬樓一九二七年刻本影印），卷四三，〈詩詞餘話〉，頁13a；劉壎，《水雲村泯稿》（明天啓刊本膠卷，北京：北京圖書館藏），卷二，〈謁詹天游學士〉，頁3b；《水雲村詩餘》（收入《疆邨叢書》〔民國十一年（1922）刻本，南京：南京圖書館藏〕），〈菩薩蠻·又

之翰為僚友時，曾相互贈物寄詩，二人間應有著良好情誼。<sup>125</sup> 在當時政治清算桑哥黨羽的氛圍下，崔彧這份奏言很可能是又一例「黨同伐異」的政治迫害。其時在清算日益嚴峻的政治壓力下，詹玉或許只是想南歸避禍，而這樣的舉動，也不為「剛直敢言」<sup>126</sup> 的崔彧放過。

崔彧有這樣的表現並不奇怪。早在至元二十八年五月，時任中書右丞的他與中書平章麥朮丁就曾上奏：

近者，桑哥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腹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如律，仍追宣敕，除名為民。<sup>127</sup>

這份奏言的打擊面相當寬泛，幾乎涵蓋桑哥理財時期所有的官僚。與十年前打擊阿合馬的餘黨相比，此時崔彧清算桑哥黨羽的熱情絲毫不減。至元二十八、二十九年間，他「不愛於言」，<sup>128</sup> 屢屢上言革除理財弊政，清算桑哥餘黨，可以說是不遺餘力，真正做到了「纖悉無遺」。當時在他的建議下，被「汰逐」的「中外諸官」應不在少數。

具體到桑哥輔政碑事件，崔彧與南人馮子振、劉道元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關係，是否二人攻訐翰林諸臣幕後的主使和支持者，雖然史無明文，但也不能就此斷然排除。因為崔彧還曾有過這樣的先例。至元二十八年七月，揚州路學正、南人李淦攻訐早已去職「南還」的葉李，揭發他「妄舉桑哥之罪」，揚言「葉李雖罷相權，刑戮未加，天下往往竊議，宜斬葉李，以謝天下」，<sup>129</sup> 直欲除之而後快。此事因葉李物故而罷休。李淦的舉動，即使不是出自於崔彧的主使，也顯然得到了他的支持。因為正是在崔彧的建議下，李淦被「授以教官」，以「旌其直言」，至於李淦是否誣告，則是「事有不待辯者」，置而不論。<sup>130</sup> 同樣，馮、劉

---

和詹天游》，頁 1b；陳宜甫，《秋巖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2 冊），卷下，〈次詹天游學士見寄韻〉，頁 7a。

<sup>125</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四，〈詹學士送簞〉，頁 2b。按詩中集賢學士詹某，當即詹玉。

<sup>126</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崔彧傳〉，頁 4038。

<sup>127</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崔彧傳〉，頁 4041-4042。按這份上奏，《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載於至元二十八年五月甲辰，文字有所節略。（頁 347）

<sup>128</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崔彧傳〉，頁 4044。

<sup>129</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頁 349；卷一七三，〈葉李傳〉，頁 4050。

<sup>130</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崔彧傳〉，頁 4044。按依崔彧之意，李淦「直言」葉李「過怨」是「事有不待辯者」，李淦並非誣告。在此崔彧是完全站在了李淦一邊。

二人攻訐翰林諸臣時，崔彧即使不是背後的主使，也很可能是積極的支持者。

更何況，崔彧與馮子振之間，還有著很好的交誼。馮子振更是視他為平生知己。大德六年（1302），馮子振撰〈居庸關賦〉，追敘往事故舊，其中云：

哽知己之博陵，久南陽之新阡。<sup>131</sup>

博陵為崔氏地望，時人多以「博陵公」來尊稱崔彧。<sup>132</sup> 馮子振在此顯然也是以「博陵」來敬指他。崔彧卒於大德二年九月，已過四年之久，馮子振仍在「哽知己」的故去，二人間的情誼可見一斑。考馮子振行實，他應是在至元二十四到二十九年、元貞元年到大德二年，這兩個時段與崔彧有所交集。<sup>133</sup> 既然是「知己」，在馮子振「明目張膽，排奸薦賢」<sup>134</sup> 攻擊翰林詞臣時，身居高位的崔彧又怎會只是一個旁觀者呢？他應就是幕後的主使和支持者。

經過以上討論，應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至元二十九年，正是在崔彧等中樞官僚的主張和支持下，翰林諸臣受到攻訐和處分，成為政治清算擴大化的犧牲者。考慮到至元二十八年五月崔彧上奏清算「中外諸官」，以及前引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上奏清算翰林諸臣，聯名者分別為中書平章麥朮丁、御史大夫月兒魯。他們二人或許也是清算翰林諸臣的主張和支持者。

## 五・忽必烈的態度和政治輿論

其次，忽必烈的態度和意見，應在輔政碑事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底桑哥倒臺後，政治清算並沒有馬上波及翰林諸臣。據史料記載，忽必烈還打算提拔翰林學士閻復進入中樞，擔任宰執。袁桷為閻復撰寫的神道碑文中云：

公（按指閻復）以文墨自任，不宜為緊要官。罷尚書省時，世祖召入便殿，諭：「以卿為執政官，何如？」公謝不能，世祖曰：「知讓，誠美事，宜勿強。」<sup>135</sup>

<sup>131</sup> 馮子振著，王毅輯，《海粟集輯存》（長沙：嶽麓書社，2009），〈居庸關賦〉，頁84。

<sup>132</sup> 王惲，《秋澗集》卷二一，〈為中丞博陵公壽〉，頁17b；張養浩，《張文忠公文集》（元刻本膠卷，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卷二三，〈上董中丞書〉，頁9a-b。

<sup>133</sup> 參見王毅，《馮子振研究》，頁32-48。

<sup>134</sup> 馮子振，《海粟集輯存》，〈居庸關賦〉，頁84。按此段文字描述的即是馮子振攻訐翰林官僚的事實。關於此節，詳見後文論述。

<sup>135</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七，〈閻復神道碑銘〉，頁11b-12a。

《元史·閻復傳》中則作：

二十八年，尚書省罷，復立中書省，帝勵精圖治，急於擇相，一日，召入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屢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sup>136</sup>

碑、傳所載大致相同。傳文指出當時忽必烈有「急於擇相」的心態。忽必烈曾有任用閻復的打算應當是真實的，還有其他史料可為佐證。楊載為趙孟頫撰寫的行狀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尚書省罷，大臣多以罪去。中書參政賀伯顏奏：「臣不通文字，大事不敢專決。今按牘盈積，四方奏請或利害所繫，不以時報。臣愚，常恐得罪不久，願陛下早擇輔相，以幸天下。」上周視左右，乃屬目於公曰：「卿宜亟至中書，參決庶政，以分朕憂。」公辭，上慰勉再三，公終辭不拜。上問：「翰林學士閻復、集賢學士宋渤二人如何？」公對曰：「皆非相才也。」<sup>137</sup>

這段描述更為詳實。其時趙孟頫任為集賢直學士。看來忽必烈是想任命一名「通文字」的翰苑官僚進入中書「參決庶政」。他最初打算提拔的是趙孟頫，在趙「固辭」後，他又提出閻、宋兩個人選，徵詢趙的意見，但趙給予了否定的答覆。

閻復的碑、傳，與趙孟頫的行狀，在忽必烈打算任命閻復為相的記載上各有異同。依閻復的碑、傳，是忽必烈親問本人，而為閻復「謙讓」推辭。據趙孟頫的行狀，則是忽必烈旁詢趙，而為趙以才能不足否決。要之各為傳主虛美，側重有所不同。趙孟頫的行狀或許更得其實。無論如何，在桑哥倒臺之初，閻復曾受到忽必烈的青睞，還有進入中樞可能的事實，應該是不容置疑的。這件事當發生於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初。

翰林學士閻復沒有進入中樞，而是很快被「首命」為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離開中央，轉任地方。<sup>138</sup>至元二十八年二月，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sup>139</sup>閻復的「首命」當是在此後不久。但他似乎並未立即就任，而是在六月後方才離開大都。赴任之際，張之翰為之送行，撰寫〈送翰林學士閻公浙西道廉訪使序〉，其中云：

<sup>136</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閻復傳〉，頁3773。

<sup>137</sup> 楊載，〈趙孟頫行狀〉，趙孟頫，《松雪齋文集·附錄》，頁6b-7a。

<sup>138</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閻復傳〉，頁3773。

<sup>139</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頁345。

靜齋閻公以翰林學士除浙西道廉訪使，命既下，每以任重辭。某義在同僚，敢告之曰：……以公之學，素所習知，以公之才，皆所優為，果南北諸道人皆如斯，何憂乎不治？……第恐朝廷早晚有大顧問、大謀議，視吾輩中不見公之風采，未必不走驛騎而趣歸。後之寵拜，豈淺淺可知？是行也，又奚辭？諸公盍餞之以詩？至元辛卯夏六月望日，邯鄲張某序。<sup>140</sup>

送序撰於六月十五日。其時當有眾多名公大臣為閻復送行，「餞之以詩」。除了這篇序文和趙孟頫的送行詩外，其餘「諸公」的詩作都沒有流傳下來。<sup>141</sup>或許忽必烈欲任其為相的事情當時已是眾所周知，故而趙孟頫、張之翰才會在送行詩、序中云「早歸黃閣慰蒼生」、「早晚有大顧問、大謀議」、「後之寵拜豈淺淺可知」等語，極盡吹捧之能事。當然，閻復外任的結局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並沒有受到「寵拜」，「早歸黃閣」，而是在大約半年多後，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初，捲入桑哥輔政碑事件，被免官罷職，成為政治清算的對象之一。送行詩、序還從一個側面表明，至少到此時為止，閻復、張之翰等人還未明顯受到桑哥事件的牽連。否則，以閻、張二人後來的遭遇，此時若已受到牽連，張之翰、趙孟頫等人還如此吹捧，對閻及張本人，不啻是一種諷刺，也顯得荒誕。至元二十九年三月清明張之翰貶赴松江時，就顯得頗為淒涼、倉惶。<sup>142</sup>政治清算擴大化直接針對閻、張等翰林諸臣，應是在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後，很可能是在這年底或者次年初。

另一方面，考慮到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初前後右丞葉李因桑哥事件「連及」，被迫「以疾」南還，以及與閻復同一時期有望進入中樞的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擔心為人所忌，「力請外補」，<sup>143</sup>而在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外任地方官的事實，再加上閻復個人後來的遭遇，他在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初被「首命」為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這一件事，又未嘗不是因遭人忌恨、被平調外放、先行排擠出政治中心、再進而加以清算的策略的結果。或許意識到此，閻復才「命既下，每以任重辭」，遷延時日，遲至六月後才赴任。

<sup>140</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四，〈送翰林學士閻公浙西道廉訪使序〉，頁 8a-9a。

<sup>141</sup> 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四，〈送閻子靜廉訪浙西〉，頁 15a。

<sup>142</sup> 張之翰離開大都時，當也有親朋、僚友相送。氏著，《西巖集》卷五，〈開船〉、〈行至通州河上〉應即此時詩作。其中有云：「親朋入城去」（頁 3b）、「幾壺光祿酒，一卷翰林詩」（頁 4a）。前文已經討論，張之翰在貶任途中，心「亂如絲」、「閒愁滿腹」，送行詩卷中想必更多的是惜別之語，而非吹捧之辭。

<sup>143</sup> 楊載，〈趙孟頫行狀〉，趙孟頫，《松雪齋文集·附錄》，頁 7b。

在元廷朝政上，有關桑哥輔政碑事件的政治攻訐，並沒有因閻復、張之翰等翰林諸臣受到清算而結束，到至元二十九年五月仍在繼續。《元史·世祖紀》載：

（至元二十九年五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為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編修官陳孚發其奸狀，乞免所坐遣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sup>144</sup>

陳孚，字剛中，浙江台州臨海人。《元史》有傳。<sup>145</sup> 這段文字前半部分是中書省臣的奏言，陳述翰林院編修官陳孚揭發攻訐翰林諸臣的馮子振也曾獻詩讚譽桑哥的事實，建議處置馮子振，免其罪責，發遣還家。後半部分是忽必烈的意見和答覆。

在此需對史料中的「詞臣」略加解釋。前一個「詞臣」指代翰林諸臣，明白無疑。後一個「詞臣」則指代不明，易生歧義。如依行文前後一致的習慣，則這個「詞臣」當與前一個相同，都是代指翰林諸臣。但這樣理解使整句話前後割裂，語意跳躍，與忽必烈的原意似乎並不相符。忽必烈的原話，「使以譽桑哥為罪……」一句，意在袒護馮子振，明其無罪。而這一句明顯又是在承接與解釋前一句「詞臣何罪」。整句話的意思應是：詞臣有什麼罪？如果稱讚桑哥有罪的話，那麼朝廷官僚，又有誰沒有稱讚過桑哥呢？我也曾稱讚過桑哥。連繫上下文，忽必烈原話的根本意思就是說馮子振曾經稱譽桑哥的行為沒有罪錯。如果這樣理解，那麼後一個「詞臣」就應是代指其時供職集賢的馮子振，<sup>146</sup> 而不是翰林諸臣。這種解釋較為合理。當然，也還存在一種可能，前後文一致，後一個「詞臣」指代的也是翰林諸臣，在「詞臣何罪」與「使以譽桑哥為罪」之間原本有一段文字，但由於史臣漏記或者誤刪，致使造成偏差，有乖原意。但這種解釋略嫌迂遠，又沒有旁證，本文姑且不取。<sup>147</sup>

<sup>144</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世祖紀十四〉，頁362。

<sup>145</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九〇，頁4338-4339。

<sup>146</sup> 參見王毅，〈馮子振年譜〉，《中國文學研究》1990.1：55-56。

<sup>147</sup> 即使文字有漏記或誤刪，後一個「詞臣」也指代翰林諸臣，忽必烈或有不願再追究「詞臣」撰碑過錯的意思（這種想法也是於史無據。畢竟閻、張等人已被罷、貶，且終忽必烈之世，境遇也未見有所改善），但忽必烈的意見重在迴護馮子振，則是昭然確鑿、無可置疑的事實，並不影響本文的討論。更何況，明清時人對這段文字也是這樣理解的。明清人的論述，詳見後文論述。



這份史料揭示出翰林諸臣撰寫桑哥輔政碑的罪責在於「引諭失當」。<sup>148</sup> 這種指責發生在碑文撰寫完成昭示天下近三年、桑哥倒臺後不久，無論如何，都會讓人感覺帶有一種欲加之罪的意味。更令人意外的是忽必烈的態度，在此他完全站在馮子振一邊。面對同樣曾稱譽桑哥的詞臣，忽必烈無疑有著明顯的偏袒傾向，翰林諸臣「罰不可恕」，或罷或貶，而馮子振則被認為沒有罪錯，不應受處分。

行文至此，令人不禁對忽必烈本人在桑哥輔政碑事件中的態度和作用產生疑問。從開始還打算提拔重用翰林官僚，到後來對翰林諸臣要求「罰不可恕」，忽必烈經歷了怎樣的思變，又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思變？為何在懲處翰林諸臣的同時，而又明顯地袒護馮子振？在至元後期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中，他究竟有著怎樣的政治考量和抉擇？

忽必烈開始還打算任用翰林學士閻復的舉動並非不可理解。桑哥倒臺之初，他對中樞機構尚書省的人事調整，頗值得關注。最重要的顯然是「首相」，也即尚書省右丞相的人選，由誰來繼任桑哥。中樞宰執參政以上的人選，一般都是由忽必烈「乾綱獨斷」，自行決定。至元二十三年，他就曾對時任中書右丞相的安童論及有關人事任命，云：「如平章、右丞等，朕當親擇，餘皆卿等職也。」<sup>149</sup> 對參政以上的人選，忽必烈歷來都是深思熟慮，很有主見。<sup>150</sup> 然而，在至元二十八年決定尚書省右丞相的人選時，他卻顯得頗為倉促、急切，過程也較費周折。他起初想任命不忽木，不忽木「固辭」，他問：「然則孰可？」不忽木推薦了時為太子詹事的完澤。<sup>151</sup> 他還諮詢過漢人侍臣賀勝、南人官僚燕公楠。《元史·賀勝傳》載：

<sup>148</sup> 頗疑「諭」為「喻」字之誤。若是「引喻失當」，即指翰林諸臣在碑文中過度、不恰當地讚譽了桑哥。若是「引諭失當」，則當指翰林詞臣撰文時不恰當、錯誤地引用了忽必烈的聖諭。依引文之意，似為「喻」字更合原義。明時人議論此事，即以為讚譽、頌德。明人記載，詳見後文論述。

<sup>149</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二六，〈安童傳〉，頁3083。

<sup>150</sup> 忽必烈對挑選宰相頗有心得，有自己的一套理論。至元十五年，他曾云：「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能兼此三者，乃為稱職。爾縱有功，宰相非可觀者。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阿里年少亦精敏，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率眾來歸，或可以相位處之。」宋濂等，《元史》卷一〇，〈世祖紀七〉，至元十五年六月甲戌，頁202。至元二十三年，當中書擬任諸人，忽必烈怒云：「要東木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脫脫忽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等所進擬，令人恥之。其以朕意諭安童。」《元史》卷一四，〈世祖紀十一〉，至元二十三年四月己未，頁289。

<sup>151</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傳〉，頁3168-3169。

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罷尚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對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sup>152</sup>

《元史·燕公楠傳》云：

又問孰可以為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童。」問其次，曰：「完澤可。」<sup>153</sup>

據藏文史料《漢藏史集》記載，他甚至還徵詢過桑哥本人的意見：

皇帝又問：「如今能勝任國事的大臣有多少？」桑哥答：「有一人，別無他人。」皇帝問：「此一人是誰？」丞相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sup>154</sup>

問答中「能勝任國事的大臣」顯然是指中樞首相的人選，忽必烈當然不可能再重新起用已罷職待決的桑哥。

忽必烈遍詢群臣，遵從輿情，最終任用曾反對桑哥理財、傾向漢法、任職東宮的蒙古貴族完澤為右丞相。這一舉動表明，在桑哥倒臺之初，他心中並沒有一個合適的宰相人選。這樣的選擇，應是他向輿論、現實政治妥協的結果。

不僅對「首相」，對其他宰執官僚，忽必烈同樣也沒有一個合適的人選。就此問題，他也諮詢過燕公楠。〈燕公楠傳〉載：

會欲易政府大臣，以問公楠，公楠薦伯顏、不灰木、闊里、闊里吉思、史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人。<sup>155</sup>

他還打算任用燕公楠為平章政事，只不過因其「固辭」而作罷。

這樣看來，前引趙孟頫的行狀，忽必烈擬任用他為宰執，並詢問閻復、宋渤是否可用的對話，以及閻復碑、傳中，忽必烈親自徵求閻復意見的記載，放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之下，就變得很容易理解了。忽必烈周詢群僚，打算任用燕公楠、趙孟頫、閻復、宋渤等人的舉動，都只不過是他當時「急於擇相」心態下的表現而已。

此外，翰苑詞臣多為「老成」人，又「居禁近」，典制誥、備顧問，接近皇帝，相較普通官僚，與忽必烈有更多的直接接觸。<sup>156</sup> 閻復即曾被忽必烈「屢召至

<sup>152</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九，〈賀勝傳〉，頁4150。

<sup>153</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燕公楠傳〉，頁4051。

<sup>154</sup> 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上篇二四，〈桑哥丞相的故事〉，頁184。

<sup>155</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燕公楠傳〉，頁4051。

<sup>156</sup> 徐乾學，〈翰林院題名碑記〉，清敕撰，《欽定詞林典故》（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9冊），卷五，〈藝文〉，頁73a；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三二，〈翰林承旨王公請謚事狀〉，頁13b；顧瑛，《草堂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三，〈吳

榻前，面諭詔旨」。<sup>157</sup> 同時，居於翰苑、集賢的官僚，又多與桑哥理財保持著一定距離，沒有多少瓜葛。<sup>158</sup> 因此，處於「急於擇相」心態下的忽必烈在最初的人事調整時，考慮起用他們，問及閻復、宋渤、趙孟頫等人，都是有可能的事情。<sup>159</sup>

從開始還打算重用翰林學士閻復，到後來對翰林諸臣要求「罰不可恕」，忽必烈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思想轉變，其原因大略有兩個。一是對清算主張和支持者的政治妥協。翰林詞臣因文得罪，以及至元二十八年初忽必烈「急於擇相」的原因，就在於桑哥倒臺了。而桑哥之所以倒臺，主要是由於蒙古、色目貴族官僚的激烈反對和政治攻訐，促使忽必烈不得不作出妥協、讓步。關於這一點，中外史籍，無論是《元史》、《史集》，還是《漢藏史集》，都有類似描述，毋庸再敘。桑哥倒臺，事實上標誌著忽必烈理財政治的又一次重大失敗。

在此需對忽必烈時代的理財政治略加論述。為緩解軍事擴張及巨額賞賜等原因造成的財政壓力，忽必烈長期以來秉持理財政治的策略。在統治的三十餘年裏，他先後任用王文統、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人主政理財，時間長達二十餘年。每一個理財時期，都存在著激烈的政治鬥爭。除王文統理財失敗是因其本人捲入李壇之亂被處死外，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人理財都是在反對理財政治官僚的極力攻訐下而遭遇失敗。阿合馬理財更是引發了元代政治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政治暗殺。儘管面臨多方反對，遭遇極大的政治阻力，甚至是嚴重挫折，忽必烈

---

克恭》，頁 440。參見張帆，《元代翰林國史院與漢族儒士》，頁 76。

<sup>157</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閻復傳〉，頁 3773。

<sup>158</sup> 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翰林、集賢等機構，還被當作處置反對理財，或者躲避桑哥迫害，遠離理財政治官僚的閑散之地。如反對理財政治、與桑哥矛盾極深的御史中丞董文用，「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為屯田，公（按指董文用）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學士承旨」。見虞集，〈翰林學士承旨董文行狀〉，蘇天爵，《國朝文類》卷四九，頁 18a。又如何榮祖，「條中外有官規程，欲矯時敝，桑哥抑不為通。榮祖既與之異議，乃以病告，特授集賢大學士」。宋濂等，《元史》卷一六八，〈何榮祖傳〉，頁 3955。至元二十七年，任職尚書省的不忽木改任翰林學士承旨的情況，當與董、何二人類似。《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傳〉，頁 3168。

<sup>159</sup> 在桑哥倒臺後，至元二十八年二月首次對尚書省所作的人事調整，新任命的四名尚書省宰執中，除了右丞相完澤外，其餘三人，平章不忽木、右丞何榮祖、參政賀勝，都是來自翰林院、集賢院。見宋濂等，《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頁 344-345。當然，他們三人能夠成為宰執，主因也並非他們的翰林、集賢身分。特別是不忽木、賀勝，都是忽必烈身邊親近的怯薛侍臣。但忽必烈在任用他們時，順及考慮到同一機構、同時又頗為親近的閻復等人，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閻復曾被忽必烈「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頗受重視。趙孟頫則是忽必烈極為欣賞的南士，宋渤為忽必烈早年器重的漢人官僚宋子貞之子。

仍然堅持其理財理念。每一次失敗，經過短暫的妥協與調整，忽必烈又都會提拔任用新的理財權臣，再次推行理財政治。同時，反對理財的政治力量也越來越強大。王文統理財時期，反對者主要是少數漢人儒臣官僚。阿合馬理財，漢人官僚是主要的反對者。盧世榮則主要是被得到少數蒙古、色目貴族支持的部分漢人官僚扳倒。而桑哥理財反對者的力量最為強大，前文已述，主要有蒙古、色目貴族及部分漢人官僚。其中很多人是權貴勳臣、忽必烈身邊最親近的怯薛侍從。

忽必烈在桑哥倒臺之初作出了一些政治妥協和調整，包括罷尚書省，廢止理財政策，清算桑哥黨羽，以及賞賜、進用在扳倒桑哥過程中發揮「至關重要」作用的蒙古權貴、怯薛侍從。對於後者，有學者認為，忽必烈此舉旨在「修復受到桑哥專權影響的皇帝與怯薛之間的關係」。<sup>160</sup> 這種看法不無道理。經過初步的調整，在中樞機構裏，反對理財、傾向漢法的蒙古、色目貴族及漢人官僚佔據了主導地位，主要由色目官僚組成主張聚斂的理財派則暫時失勢。周良霄先生稱：「這時的中央行政權力的天平上，漢人儒臣與真金的一派，又暫時壓過了色目官僚。」<sup>161</sup> 至元二十八年的情況確實如此。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處於妥協地位的忽必烈並不反對，或者默認由部分中樞官僚主導的對捲入桑哥輔政碑事件翰林官僚的清算，應該是可以理解的。當然，對於「皇權獨尊」<sup>162</sup> 的忽必烈來說，這種妥協只是暫時的，他並不甘心接受理財政治的失敗，也不甘心放鬆對朝政的控制。桑哥輔政碑事件後不久，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多名與前述反對理財、傾向漢法中樞官僚並無多少交集的色目勳貴進入中書，擔任平章、右丞等職。<sup>163</sup> 他們也都是忽必烈身邊的怯薛宿衛。任用他們，顯然是忽必烈個人意志的體現，有利於增強他對中樞機構的控制。忽必烈的這種做法並不奇怪，也並非第一次。在前幾次理財政治失敗之後，他同樣也是經歷暫時的妥協，又轉而起用新的理財權臣，重新開始新的理財政治。阿合馬遇刺後，傾向漢法的和禮霍孫被任為中書右丞相，但不到兩年即被罷，開啓盧世榮理財時期。盧世榮倒臺，安童主持朝政，一年多後，即被桑哥取代。在至元二十九

<sup>160</sup> 參見李治安，《忽必烈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654-656。

<sup>161</sup> 見周良霄，《忽必烈》，第一二章〈老年的政治〉，頁 208。

<sup>162</sup> 參見張帆，〈論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徵〉，《北大史學（第八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50-75。

<sup>163</sup>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己酉，「以大司農、同知宣徽院事兼領尚膳監事鐵哥，翰林學士承旨、通政院使兼知尚乘寺事刺真，并為中書平章政事，兼領舊職。……以阿里為中書右丞，梁暗都刺為參知政事」。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世祖紀十四〉，頁 361。

年三月後，忽必烈又對中書省作了若干調整。<sup>164</sup> 按照忽必烈的政治理念和意圖，如果不是在至元三十一年初去世，很難說他不會再次起用新的理財官僚，從而開啓新的理財政治。<sup>165</sup> 甚至可以更為大膽地推測，如果他晚幾年去世，閻復、張之翰等翰林官僚，或許還有重返大都任職中央的機會。

探究忽必烈思想變化的原因，還需充分考慮他的政治個性，翰林諸臣的遭遇，還可能是他諉過、遷怒的結果。桑哥倒臺後，忽必烈雖然也曾對「過聽桑哥」表現出一些後悔、慚愧，<sup>166</sup> 但更多的是推諉責過、遷怒旁人。他責備平章阿魯渾薩理：「桑哥為政如此，卿何故無一言。」怪罪另一位平章帖木兒「為言不早」。將責任歸咎於別人，而不檢討自己「信任桑哥甚」、「言不用」的過錯。<sup>167</sup>

他還遷怒於監察機構御史臺的工作不力。桑哥專權時期，「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sup>168</sup> 因反對理財，臺吏王良弼、監察御史周祚被誣殺、流放，侍御史程鉅夫被報復繫獄，御史中丞董文用被排擠出御史臺。<sup>169</sup> 作為監察機構的御史臺深受打擊和壓制，這是忽必烈很清楚的事實，而且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對桑哥的信任和支持。然而，當清算桑哥罪惡時，御史臺卻被追究失察的責任。《元史·桑哥傳》載：

（忽必烈）責御史臺曰：「桑哥為惡，始終四年，其奸賊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對曰：「知之。」世祖曰：「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數日不決。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者存之。」<sup>170</sup>

<sup>164</sup> 至元三十年十一月己卯，「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顏入為中書省平章政事，位帖哥、剌真、不忽木上」。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世祖紀十四〉，頁375。

<sup>165</sup> 有學者認為，至元末期進入中書省的伯顏、梁暗都剌，就是忽必烈繼阿合馬、桑哥後物色到的理財大臣。從至元末年到成宗大德年間，二人秉政十餘年，開展理財活動，支撐成宗時期的財政局面。見丁國範，〈至元大德年間的「賽梁秉政」〉，《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2/13（1989-1990）：20-28。

<sup>166</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傳〉，頁3168。

<sup>167</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三〇，〈阿魯渾薩理傳〉，頁3176；屠寄，《蒙兀兒史記》卷九一，〈也速驪兒傳〉，頁7b。

<sup>168</sup> 宋濂等，《元史》卷二〇五，〈桑哥傳〉，頁4575。

<sup>169</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四，〈世祖紀十一〉，至元二十四年五月壬寅，頁298；卷一六，〈世祖紀十三〉，至元二十八年七月戊申，頁349；卷一七二，〈程鉅夫傳〉，頁4017；卷一四八，〈董文用傳〉，頁3500。

<sup>170</sup> 宋濂等，《元史》卷二〇五，〈桑哥傳〉，頁4576。

遷怒臺臣，這還不是忽必烈第一次這樣做。早在十年前清算阿合馬罪惡時，他就曾同樣諉過於御史臺監察不力，以致除極個別人外，「臺臣皆罷去」。<sup>171</sup> 連政治立場與桑哥截然相反的臺臣也受到牽連，被「斥罷」，態度曖昧、曾經頌揚桑哥的翰林諸臣遭遇遷怒，「罰不可恕」，或許也就不那麼難以理解了。

忽必烈的這種政治個性，也有助於解釋他明顯偏袒馮子振的原因。忽必烈在阿合馬、桑哥事件中諉過、遷怒他人，或許是他不甘心承認理財政治失敗，變被動為主動，維護和鞏固自身權力地位的一種表現。他很可能因此而諱言己失、文過飾非。明人姜南曾評析忽必烈偏袒馮子振的做法，云：

元世祖時，馮子振嘗為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喻失當。國史院編修官陳孚發其奸狀，乞免所坐遣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吁！子振反復小人，固不足道也。帝所以諱子振之罪者，正所以諱己用桑哥之失也！<sup>172</sup>

姜氏認為忽必烈此舉實質是忌諱自己任用桑哥的錯誤。這種見解是有一定道理的。《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就曾評價忽必烈的性格中，有「吝於改過」的一面。<sup>173</sup>

還應注意的是，馮子振是一名南人。至元二十四年，馮來到大都。除了曾「為詩譽桑哥」，他與桑哥及理財活動並沒有什麼瓜葛，這也可能是忽必烈袒護他的一個原因。此外，忽必烈一向對南人有一種特別的「偏愛」。南北統一之後，忽必烈有意識地選拔和任用南士，葉李、燕公楠、留夢炎、趙孟頫等人就是在這一政治策略下，先後進入元廷，成為高級官僚。<sup>174</sup> 桑哥倒臺後，對於捲入頗深的

<sup>171</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五一，〈杜思敬傳〉，頁 3575；柳貫，《柳待制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元刊本影印），卷八，〈謚議·杜思敬謚文定〉，頁 21b。

<sup>172</sup> 姜南，《投齋隨筆》（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1915），〈馮子振反復〉，頁 6a。

<sup>173</sup> 柯劭忞，《新元史》（北京：中國書店，1988，據一九三〇年庚午重訂本影印），卷一二，〈世祖紀六〉，頁 52 上。

<sup>174</sup> 對於忽必烈參用南士的目的，周良霄認為是藉以安撫江南人民，及牽制、抑制北方漢人儒臣，見周良霄，《忽必烈》，第一二章第一節〈參用南士與依靠近侍〉，頁 198-200。李治安支持這種觀點，並認為還有蒐羅江南精英為我所用的動機和客觀需要，見李治安，《忽必烈傳》，頁 362-363。李氏觀點應還兼取了姚從吾與陳得芝二位先生的見解。參見姚從吾，〈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姚從吾先生全集》（臺北：正中書局，1982），第 7 冊，頁 42-53；陳得芝，〈程鉅夫奉旨求賢江南考〉，《內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後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頁 546-547。

葉李，忽必烈也是袒護有加，不以為罪。<sup>175</sup> 以此相度，馮子振受到忽必烈的偏袒，也就不足為奇。

忽必烈素稱「知人」，在他眼裏，馮子振很可能還是一位「廉介剛直」的敢言之士。<sup>176</sup> 攻訐翰林官僚，正是其奮不顧身、忠貞為國的表現。至少馮子振是這樣看待自己的。翰林諸臣受到攻訐、忽必烈袒護馮子振的史事，馮子振本人曾經有所描述，只是立場完全不同。大德六年，馮子振撰寫〈居庸關賦〉，其中云：

憶尚方借劍之始，有蟠木為容之先。蓋嘗明目張膽，排奸薦賢。流涕為書，瀝血為箋。噫屋嗔其何為，咄山謗亦偶然。宣臆於紫檀九重之陛，拜命於龐村四方之旻。梗孤生之大概，受先帝之深憐。<sup>177</sup>

經過前面的討論，馮子振所謂「嘗明目張膽，排奸薦賢。流涕為書，瀝血為箋」的往事，無疑就是至元二十九年前後他在桑哥倒臺後的表現，也即攻訐「桑哥同列」翰林諸臣「罪惡」的舉動。只不過攻訐一事，在他認為是「排奸」的正義之舉，並為此「流涕」、「瀝血」，為書作箋。賦中「屋嗔」、「山謗」等語，大約指的就是陳孚及「中書省臣」等人指責他為「妄人」，揭發其「奸狀」，「嘗為詩譽桑哥」的事實。所謂「受先帝之深憐」，又顯然是在感激忽必烈讓他免受「坐遣還家」處罰的袒護之舉。

前文已論及，馮子振的行為，應得到了「知己」、時任御史中丞崔彧的支持。時人也讚譽他是「忠言如海膽如山」。<sup>178</sup> 只是人見人殊，除了陳孚等人認為他是別有用心，詆毀其為「妄人」外，後人也多鄙薄其為「反覆小人」、「傾危之士」。<sup>179</sup> 其中是非，不屬本文討論範疇。但在當時，馮子振的為人、行事，無疑應是得到了忽必烈的認同和「深憐」的。

附帶談一下馮子振此後的遭際。雖然在忽必烈的袒護下，馮子振沒有被追究責任，但他還是在這一年離開了大都。大德七年，他在另一篇賦文中云：

數不我偶，志與願違。間一歲而壬辰（按即至元二十九年），驟驛埃而決歸。<sup>180</sup>

<sup>175</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葉李傳〉，頁4050。

<sup>176</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世祖紀十四〉，頁377；卷一七三，〈葉李傳〉，頁4050。

<sup>177</sup> 馮子振，《海粟集輯存》，〈居庸關賦〉，頁83-84。

<sup>178</sup> 宋无，〈上馮集賢〉，顧嗣立編，《元詩選·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278。

<sup>179</sup> 王夫之，《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5），第15冊，〈和梅花百詠詩〉，頁609。

<sup>180</sup> 馮子振，《海粟集輯存》，〈十八公賦〉，頁71。王毅認為該賦當作於大德七年初。見王

他的「決歸」，應該是迫於某種壓力。這種壓力，當還是來自於支持陳孚、建議把他「遣還家」的「中書省臣」。也就是說，即使有忽必烈的袒護，馮子振仍然不免於政治對手的打壓和排擠，被變相「遣還家」。他再次來到大都，是在三年之後的元貞元年，這或許是「知己」崔彧施加援手的結果。

第三，其他漢人官僚的態度及政治輿論，也應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大部分漢人官僚秉持儒家傳統學說，是理財政治的堅定反對者。他們與理財權臣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人都有著尖銳的矛盾和衝突。極少數漢人官僚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參與，或者支持理財活動，一旦理財權臣失勢，他們不僅會受到嚴厲的政治清算，還會在精神上承受來自其他漢人官僚方面的輿論抨擊。盧世榮理財失敗後，捲入其中的漢人官僚、中書左丞史彬就是因為背負極大的精神壓力，「伊鬱而自沮」，終至「憂悸而殞越」，甚至在他死後，還有「云云」議論者。<sup>181</sup> 這種精神壓力，除了來自政治失勢的挫折感、遭受清算的恐懼感外，也還來自於對理財持反對態度其他漢人官僚、「云云」者們強大的政治輿論壓力。<sup>182</sup>

前文已經論述，捲入桑哥輔政碑事件的張之翰，在至元二十九年，曾「取謗招讒」，捲入「風波」，受到「炎如火」的「讒口」攻訐，經歷「人情」冷暖，最終仕路「下坡」，被貶職外放。張之翰所經受的「炎如火」的「世間讒口」，應當不只來自於南士馮子振等人的攻訐。張之翰在遭遇貶降前後，還曾感慨，「人方睥睨鬼揶揄，玉堂雖好非所居」、「一從失腳落紛華，幾被傍人生訕侮」。<sup>183</sup> 這些「睥睨」、「揶揄」、「訕侮」他的讒言謗語，應該就來自於曾與他同殿為臣、反對理財政治的其他漢人官僚。

桑哥倒臺之後，張之翰等翰林諸臣，因曾參與撰寫輔政碑文，為之歌功頌德，而受到強大的輿論壓力，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元代前期圍繞理財政治而展開的激烈政治鬥爭中，反對理財的漢人官僚極重視個人立場、出處進退。中統、至元初年，反對王文統、阿合馬理財的名儒許衡，就曾「屢進屢退」，「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君召輒往，進輒思退」，<sup>184</sup> 以這種忽進忽退、半進半退的方

---

毅，〈馮子振年譜〉，頁 57。

<sup>181</sup> 王惲，《秋澗集》卷一九，〈左丞袁公哀辭〉，頁 12a。

<sup>182</sup> 參見毛海明、張帆，〈史彬事迹鉤沉〉，頁 134-141。

<sup>183</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三，〈寄答徐容齋參政〉、〈和愚公韻〉，頁 7a-b。由內容判斷，這兩首詩都應作於張之翰任職松江時。

<sup>184</sup> 王旭，〈上許魯齋先生書〉，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三七，頁 19a；歐陽玄，《圭齋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明成化刊本影印），卷九，〈元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國



式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許衡的作為，獲得了時輩與後世的高度評價，被認為是「一於義而不苟，伸於道而不屈」、「視富貴如浮雲」、「去就從容」、「屹傾波之砥柱」的「神明」真儒。<sup>185</sup> 至元年間的文士領袖、曾任翰林學士承旨的王磐，秉性「剛方」、「古直」，「道德淵深，人品峻潔」，「臨大節不可奪」，「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文于碑，磐拒弗與」，<sup>186</sup> 因此而為後人推重。<sup>187</sup> 至元二十二年盧世榮「用事」時，家居衛州的王惲被薦充中書省左司郎中，「屢趣不應」，認為盧世榮理財是「力小任重，剝衆利己」，並不能長久。「既而果敗，眾服其識先而有守」。<sup>188</sup> 王惲還在寫給友人的書信中闡釋「有守」之道，「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而寧；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其咎即徵」。<sup>189</sup>

與之相對，那些在權臣理財時期依違緘默、無所作為的漢人官僚，則會受到抨擊和指責。至元十八年左右，漢人官僚在高層政壇的代表、長期擔任中樞要職、時任樞密副使的張易，就受到樞密院同僚趙良弼的當面指責，「視權臣（按指阿合馬）奸欺，結舌其傍，若無與己然者」。<sup>190</sup> 曾經「所至有能聲」的高級官僚張惠，「及老，頗以沉浮取譏」，<sup>191</sup> 應該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而為輿論抨擊。

雖然翰林院並非理財機構，作為文學侍從之臣的翰林官僚，也不參與具體的

---

子祭酒贈正學垂憲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正許先生神道碑》，頁 5b。參見張帆，〈《退齋記》與許衡劉因的出處進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態之一斑〉，《歷史研究》2005.3：75-80。

<sup>185</sup> 王旭，〈上許魯齋先生書〉，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三七，頁 19a；許衡，《魯齋遺書》（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1 冊，據明萬曆二十四年江學詩等刊本影印），卷一四，〈先儒議論·薛文清公讀書錄〉，頁 3b-4a；王惲，《秋澗集》卷六六，〈中書左丞許公真贊〉，頁 24b；耶律有尚，〈考歲略〉，許衡，《魯齋遺書》卷一三，頁 32a。

<sup>186</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王磐傳〉，頁 3755；王惲，《秋澗集》卷五九，〈碑陰先友記〉，頁 8a；卷六八，〈翰林學士承旨王公制〉，頁 7b。

<sup>187</sup> 詳見下文。

<sup>188</sup> 王公孺，〈大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王公神道碑銘并序〉，王惲，《秋澗集·前附》，頁 14a。

<sup>189</sup> 王惲，《秋澗集》卷四五，〈答客問〉，頁 13b。

<sup>190</sup>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一，〈樞密趙文正公〉，引姚燧撰〈趙氏家廟碑〉，頁 228。按這段文字，姚氏句讀錯誤，本文重加標點。這段文字描述的是趙良弼指責張易的事實，參見唐長孺，〈補元史張易傳〉，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591。

<sup>191</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七，〈張惠傳〉，頁 3924。

理財活動，而且撰寫輔政碑文更多只是奉命而為，並不代表翰林諸臣支持或擁護桑哥本人及理財活動，但在激烈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卻很容易授人附炎趨勢、立場曖昧的口實。在秉持儒家傳統學說、堅定反對理財政治的其他漢人官僚眼裏，參與撰寫碑文，為權臣歌功頌德，本身就是於大節有虧、操行無守的「不可為」之舉。當桑哥倒臺之後，他們的這種行為，很容易被放大成一個政治污點。而這種污點，對崇尚名節的漢人官僚來說，又是不可以接受的。明人于慎行曾將捲入桑哥輔政碑事件的閻復，與前述在至元中期拒絕為權臣阿合馬撰寫碑文的王磐相比較，作過一番評價。云：

王磐、閻復皆元之文士也。阿合馬當權，致重幣求碑，磐拒弗與。而閻復為桑哥立輔政碑，桑哥既誅，復亦連坐。即此二事，毋論其人品不同，而文章之流別，未必不從此分也。世有以文自命，而為權相誦德比擬失倫者，即出入先秦兩漢，亦奚以為哉！何也？文之已卑也。嗟夫！世之為復不為磐者，一何多哉！<sup>192</sup>

在于慎行看來，閻之較王，不僅僅是「人品不同」，甚至文章的流別，也是判然有異，「文之已卑也」。于氏的觀點非常明確，他對閻復捲入桑哥輔政碑事件，「為權相誦德」的行徑，是大加撻伐，公開指斥。

來自其他漢人官僚針對翰林官僚的輿論抨擊，應非僅止於撰寫輔政碑文一事。除了撰寫輔政碑，翰林官僚在桑哥柄政期間，還曾有兩次與桑哥及理財政治發生關係。其一是至元二十四年，翰林諸臣為桑哥攫取權力引經據典，提供依據。《元史·桑哥傳》載：

（至元二十四年）十月乙酉，世祖遣諭旨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翌日，左丞葉李以翰林、集賢諸臣所對奏之，且言……遂以桑哥為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sup>193</sup>

在桑哥以「丞相領尚書省」的任命中，翰林諸臣眾口一辭的奏對無疑是「與有力焉」，起了正面、積極的作用。

其二是至元二十七年北方地震，翰林官僚奉旨討論「致災之由」。《元史·趙孟頫傳》云：

<sup>192</sup> 張萱，《西園聞見錄》（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據哈佛燕京學社一九四〇年刊本影印），卷八，〈著述〉，頁41a-b。

<sup>193</sup> 宋濂等，《元史》卷二〇五，〈桑哥傳〉，頁4572。

是歲(按至元二十七年)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撒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為對，莫敢語及時政。<sup>194</sup>

作為「議者」的翰苑官僚，在這裏顯然是「畏忌」避言，明哲保身。

翰林官僚在這兩件事中的表現，也是有失名節，不會見容於當時輿論的。依據閻、張二人的履歷，至元二十四年奏對的翰林諸臣中，應有閻復，而無張之翰。至元二十七年議事的翰林院官，應包括閻、張二人。<sup>195</sup>

這些「皆極天下之選」、老於仕宦、有著較豐富政治經驗的翰林官僚，不會不知道在理財政治中的這些作為可能會帶來的輿論後果。他們為何又甘願冒著仕途、清譽受損的風險，依違附和，並參與輔政碑文的撰寫呢？除了懾於桑哥威勢而屈從之外，<sup>196</sup> 可能還有以下原因。一是奉旨行事，引經據典奏對、議論災異、撰寫碑文，都是稟受忽必烈的旨令。無論理財政治的結局如何，翰林諸臣奉旨行事，並不負有「言責官守」。二是眾人所為，眾多的翰林官僚參與政事議論、碑文撰寫，責任並不由某一個人具體承擔，存在罰不責眾的僥倖心理。此外，這些翰林官僚大多名望素著、交友廣泛，與朝野內外其他漢人官僚有著各種聯繫和交誼，或許可以獲得輿論的同情、諒解。況且以前「亦頌阿合馬功德」的翰苑官僚在至元二十年左右的政治清算中，也並沒有受到什麼處分和牽連。遺憾的是，桑哥倒臺後，以上可能性都沒有發揮作用，翰林諸臣受到清算、懲處，也遭遇到政治輿論的嚴厲抨擊。

<sup>194</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二，〈趙孟頫傳〉，頁4020。

<sup>195</sup> 依據前文第三部分的討論，至元二十四年奏對的翰林諸臣中，應該還包括李謙、趙與峘、唐方三人，可能還有楊文郁、李濤、李槃、李天英、王之綱等人。至元二十七年議政的翰林院官，應該包括趙與峘，可能還有楊文郁、李濤、李槃、唐方、李天英、王之綱等人。

<sup>196</sup> 桑哥「專政」期間，權勢極大。宋濂等，《元史·桑哥傳》載：「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己」。(頁4571, 4575)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二〇，〈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云：「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桑葛)又自謂公(按指時任御史中丞的董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頁11b) 楊載撰〈趙孟頫行狀〉記，至元二十七年，翰林、集賢院官討論地震會議後，向尚書省傳達詔旨，「桑哥會兩院諸公於都堂，舉目圍視，諸公辟易屏息，不敢出氣」(趙孟頫，《松雪齋文集·附錄》，頁5a)，桑哥威勢可見一斑。「無可誰何」，「具食丞相府」的「百司」中，應當就有翰林官僚。

在現有史料中，並沒有明文記載有哪些漢人官僚曾「睥睨」、「揶揄」、「訕侮」、指責過翰林諸臣，給他們帶來「炎如火」的輿論壓力。與張之翰交好、張曾經寄詩請求施加援手的何榮祖、馬紹、徐琰等人，應該不在其列。抨擊、指責翰林諸臣的，很可能是那些在桑哥理財時期遭受打壓、或者與理財政治保持距離，此時能夠保持某種超然態度、或者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漢人官僚。從某種角度講，這些官僚甚至可能是桑哥輔政碑事件的「受益者」，有可能因翰林諸臣的遭遇而「獲利」。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受到舉薦的十名「昔任詞垣風憲，時望所屬而在外者」中的某些人，以及舉薦者，或許就在這些漢人官僚之列。這些人中間，肯定不乏與閻復、張之翰熟稔、曾經深交的古舊僚友，或許正因為此，當他們也抨擊翰林諸臣時，張之翰才會激憤難平，屢屢言及「故人水東流，直道日西沉」、「世味直從嘗後得，人情宜向遠中疏」，<sup>197</sup> 感嘆世事變幻、輿論不公。

當然，張之翰的感慨，更多的是站在自我立場上的個人抱怨。站在批判者其他漢人官僚的立場，可能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感觸。更何況，前文已經討論，翰林諸臣在桑哥理財時期的表現，又並非白璧無瑕、無可指責。前引桑哥倒臺後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徵召「時望所屬而在外者」的「耆德」十人中，名列榜首的胡祇通就曾撰文感喟士風，評論當時的士人官僚。<sup>198</sup> 其中有云：

今之士大夫……及其居高位，食厚祿，怙寵患失，依阿緘默。荷眷顧、蒙寵渥，始終二十餘年之久，而未嘗建白一言，開陳一事，樹立一政。皇皇汲汲、日夜營辦者，廣田宅、多妻妾、殖貨財、美車馬、聚玩好、媚權貴、援私黨、來賄賂。……而又欺世盜名，翻經閱史，鼓琴焚香，吟詩寫字，以為高雅，以示閒暇。……

切身之事，莫切於進退，……一進一退，俱不中節，可亦進，不可亦進，利亦趨，害亦趨，不察得喪，不問義利。……苟得其位，阿時而行，顛倒訛繆，一莫之問，又從而文飾之，褒美之。苟得其所，依託跡於非類，逢

<sup>197</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和光輔吾友見示韻〉，頁 9b；卷六，〈有寄〉，頁 2b。按據詩意，〈和光輔吾友見示韻〉一詩當作於張之翰任職松江時。光輔應即曹光輔，曾任鎮江、揚州路教授。《西巖集》中還收錄有兩首張之翰寫給他的詩作，也應當作於任職松江期間，見卷三，〈喜光輔府教授至〉，頁 11a-b；卷七，〈寄曹光輔揚州教授〉，頁 15a-b。參見徐凌雲，〈白樸交游考辨八題〉，《文學遺產》1993.6：80-81。〈有寄〉詩當也作於同一時期，參見前注 52。

<sup>198</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世祖紀十四〉，頁 361；卷一七〇，〈胡祇通傳〉，頁 3993。

迎媚合，惟恐不收錄於門。喪身敗家之禍不旋踵而至，終亦莫之悔悟。生陷身於惡流，死誅名於清論。……<sup>199</sup>

胡祇遹的言論應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漢人官僚的意見，有著廣泛的輿論基礎。他發出這份議論的具體時間不明，但依其中「始終二十餘年之久」一句，撰文應是在至元後期，不早於至元十九年阿合馬遇刺、理財失敗這一階段。若是撰寫於至元二十八年左右，那他抨擊的對象「今之士大夫」，顯然應包括捲入桑哥輔政碑事件的翰林諸臣在內。即使撰文早於至元二十八年，並非為輔政碑事件而作，但在至元二十八年左右，如有其他漢人官僚發出同樣的議論，抨擊翰林諸臣在理財時期的作為，面對這番義正辭嚴的指控，翰林諸臣又何可「逃於天地之間」呢？而這完全是完全有可能的。

由此看來，在桑哥倒臺後，身居「清華優秩」的「玉堂」，「日得考古論文」，「日惟撰著為職」，<sup>200</sup> 曾撰文歌頌桑哥的翰林諸臣，被其他漢人官僚視為在桑哥理財期間「依阿緘默」，不知進退，「阿時而行」，「逢迎媚合」，處於這樣的「清論」之中，就很自然了。在這樣的輿論之下，張之翰等人不安於位，「自請外補」，也就在所難免。而張之翰貶任之後，屢屢求助於身居高位，曾提拔過他的不忽木，與其交好的馬紹、何榮祖、徐琰等人，<sup>201</sup> 卻未見有任何效果，也很可能就是由於這種強大的「清論」壓力，令他們暫時無從施援。

現存元代史料中，沒有至元二十九年有哪些漢人官僚，以及又是如何抨擊翰林諸臣的明文記載，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事過兩年之後，被免官罷職的閻復等人又重新回到大都，任職翰林、集賢院，被尊為「耆德舊臣」，<sup>202</sup> 顯耀於詞林、政壇近二十年。批評者與被批評者又同僚共事，還很可能往來唱和、把酒言歡。在這樣的情況下，雙方都諱言舊事，後來者又為尊者諱，於碑、傳中不著一言，因此才未見留下相關文字記載。貶任松江的張之翰，如果元貞二年沒有去世，也未必就會終老於知府任上，將來應當還有重返大都的機會。

總之，至元二十九年左右發生的桑哥輔政碑事件，有著深刻的政治內涵和背

<sup>199</sup> 胡祇遹，《紫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6 冊），卷二〇，〈悲士風〉，頁 62a-63b。

<sup>200</sup> 李謙，〈壽七十詩卷序〉，王惲，《秋澗集·前附》，頁 4a；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九，〈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頁 135；謝端，〈送張文琰序〉，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三六，頁 19a。

<sup>201</sup> 詳見後文論述。

<sup>202</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九，〈成宗紀二〉，大德二年正月己酉，頁 417。

景，絕非一起簡單、孤立的政治事件。它表面上是一起文字之禍，但實際上卻與當時、乃至整個至元後期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是至元後期政治的一個縮影。認知到這一點，才能對整個事件有更深層次的掌握，也才能更清晰地理解捲入事件的張之翰等人仕途命運的沉浮與結局。

## 六·餘論

以上對桑哥輔政碑事件的探討，主要是圍繞翰林官僚張之翰至元二十九年的仕宦轉折而展開的。最後，本文對張之翰貶任松江之後的行實再略加論述，使大家對桑哥輔政碑事件，及其個人的仕宦沉浮，能有一個更完整的認識。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清明張之翰在赴任松江的途中曾寫下兩闕詞作，表達他彼時的心情。其中一闕在前文已作節引，為方便論述，不妨完整逐錄於下：

辛卯（二十八年）清明日，嘗以〈金縷曲〉侑觴，今年獨無，可乎？因作〈摸魚子〉一闕以寄意。

問誰知此時情緒？忽忽寒食相遇。東風可是無閑暇，開盡白紅千樹。春幾許。還又怕、轉頭風雨留難住。浮生浪苦。且攜酒重尋，去年花下，歌我舊〈金縷〉。

樽前友，惟有青山如故。至今面目無妬。冷光晴色三千丈，斜照夕陽窓戶。堪訝處。被幾葉風帆，催上江南路。無人自語。想五載居京，一朝得郡，却甚也能去。<sup>203</sup>

另一闕詞牌名〈水龍吟〉，是為留別而作，依據內容，可知作於同時。詞云：

別來幾度秋風，數千里外還重遇。虛齋晝掩，厭厭多病，賴君看護。鵝鴨比鄰，魚蝦市井，擬留余住。被催（人）〔入？〕天上，除書一紙，又催過、江南去。

一夜扁舟風雨，問誰知此時情緒？明朝回首，荒城古塔，離亭高樹。點檢囊中，錦牋半是，秋巖佳句。待從今，且把新詞閣起，共何人賦？<sup>204</sup>

<sup>203</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二，〈摸魚子〉，頁9a。

<sup>204</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二，〈水龍吟·留別〉，頁2a-b。按這闕詞作當是路過高郵，寫給友人王秋巖的。《西巖集》中還收有三闕張之翰寫給他的詞作，分別見卷一一，〈南鄉子〉「謝王秋巖元帥重陽送餼果」、「和秋巖重陽」（頁2a-b）；卷一二，〈水龍吟·秋巖既別是日晚又訪余龍城外復以前韻寄謝〉（頁3b-4a）。

因捲入桑哥輔政碑事件而被貶官，不得不前往松江赴任的張之翰，在兩闋詞中發出了同一個慨嘆——「問誰知此時情緒」。在經過了前面的討論後，或許可以稍稍理解，剛剛經歷了橫遭指責、讒口攻訐政治風波，仕宦走「下坡」路的張之翰，在赴任途中，內心充滿著怎樣的憤懣、落寞與無奈。

中國古代胸懷「濟世」抱負的儒士官僚，並非總是一帆風順，仕途平坦。相反他們往往罹遭磨難，飽受挫折。雖然仕宦坎坷，但從不因此而放棄「用世」的責任和機會。張之翰也不例外。履任松江的第二年，張之翰主持修建浙西鹽倉。至元三十一年，為民請命，與達魯花赤麻合馬赴行省陳訴減除民眾承擔的十餘萬荒租稅負。元貞元年，修建松江府廨、貢舉堂，創建西湖書院。<sup>205</sup> 他的主要政績，明嘉靖《廣平府志》總結道：

減汰虛數租米十萬石。又創西湖書院，起先聖燕居樓，復貢舉堂，建松江小學，立上海縣學，作三賢祠，修築社稷壇。百廢俱興，綽有古循吏風。<sup>206</sup>

在短短的兩、三年內，作為地方官的張之翰能取得如此成就，著實難能可貴。他從行動上踐行了中國古代儒士官僚經世致用的理想，紓緩民難、實行文治、教化地方。從這個角度講，張之翰任職松江知府這一階段，的確是其「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sup>207</sup>

張之翰在松江任上取得的成就，對其政治境遇的改善，卻似乎並沒有起到多大作用。「一從失腳落紛華，幾被傍人生訕侮」，<sup>208</sup> 捲入桑哥輔政碑事件的政治污點，令他還不時遭到他人的冷語閒言。相比其他受到桑哥事件牽連的官僚，張之翰的政治處境似乎更加艱難。至元三十一年，元成宗即位，閤復「以舊臣召入朝」，<sup>209</sup> 重返大都，授集賢學士，遷翰林學士，升承旨，顯宦於成宗、武宗兩朝。同一年左右，在至元二十九年初外任濟南路同知的趙孟頫，也因「會修《世

<sup>205</sup> 分別見張之翰，《西巖集》卷一六，〈浙西鹽倉記〉、〈松江府廨記〉、〈貢舉堂記〉、〈西湖書院記〉，頁 1a-2b, 3a-4b, 9a-12b。其中蒙古、色目人名，多經四庫館臣篡改，殊不可取。可參看顧清，正德《松江府志》卷一一，〈官署上·公廨記〉，頁 3a；卷一二，〈學校上·貢舉堂記〉，頁 15b-16a；卷一三，〈學校下·書院記〉，頁 21b-22b；卷一四，〈浙西鹽倉記〉，頁 17b-18a。

<sup>206</sup> 陳棐，嘉靖《廣平府志》卷一二，〈賢行志·鄉賢〉，頁 13a。

<sup>207</sup> 見劉立華，〈元代詞壇上的父子詞人〉，第一章第一節「張之翰生平及詞的創作概述」，頁 10。

<sup>208</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三，〈和愚公韻〉，頁 7a-b。

<sup>209</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閤復傳〉，頁 3773。

祖實錄》」，被召還京師。<sup>210</sup> 而張之翰卻仍然滯留於松江，直到終老。據元人陶宗儀記載，張之翰卒於元貞二年。<sup>211</sup> 明嘉靖《廣平府志》亦記他「年五十四，卒於官」。<sup>212</sup>

偏居松江的張之翰也曾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去世，成宗即位前後，張之翰密切關注朝局變化，先後上書〈傳國璽表〉、〈賀登極表〉、〈改元元貞賀表〉、〈賀皇太子表〉，<sup>213</sup> 歡呼新帝的繼立。上〈議科舉〉，<sup>214</sup> 積極參與國家大政的討論。他還給位踞朝中的權貴、舊友寄文傳意，請求施以援手。在前引寄給時任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的詩中，他訴說無奈，表達「赤心」，感歎白髮徒勞，歲月易過，希求「宰相薦賢」，得到幫助以離開松江。《西巖集》卷六他寄給右丞何榮祖的兩首詩作，云：

長記都門送別詞，南來一讀一回思。已離猶自防遭謗，未滿如何敢寄詩。  
流轉殊方情緒苦，侵尋老境鬢毛知。諸君近日安排盡，未識遺才更有誰？

年少追隨鬢欲霜，可無清夢到門牆。瓜期三載又過却，梅信一枝誰寄將。  
鴻雁未安徒作陣，鱸魚雖好也思鄉。百年強半光陰了，只有還山望主張。<sup>215</sup>  
「瓜期三載又過却」，詩當作於元貞元年左右。除了表達「流轉殊方」的內心苦楚外，張之翰想「主張」的，還是希望何榮祖能作一些「安排」，改變「遺才」自身的命運。同一時期，他給江浙行省參政徐琰、右丞馬紹寄詩，表達類似的訴求。<sup>216</sup>

但是張之翰的努力並未產生效果。他未能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如閻復般重返大都，再獲顯職。這或許與他聲望不夠、資歷淺薄，並非耆老「舊臣」有關。或許正因為此，相比於閻復，他更容易受人攻訐，在爾虞我詐、複雜變幻的政治鬥爭中，更難以洗脫垢名，重新翻身。屢受挫折的張之翰在元貞元年左右開始尋求

<sup>210</sup>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二，〈趙孟頫傳〉，頁4021。

<sup>211</sup>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七，〈桃符識〉：「張之翰，字周卿，邯鄲人。由翰林學士除授松江知府。自題桃符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卒，亦識也。」（頁342）

<sup>212</sup> 陳棐，嘉靖《廣平府志》卷一二，〈賢行志·鄉賢〉，頁13a。

<sup>213</sup> 均見於張之翰，《西巖集》卷一三，頁1a-3a。按，〈賀皇太子表〉題目當有誤，依據內容，應題為〈賀皇太后表〉。

<sup>214</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三，頁6a-7a。

<sup>215</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六，〈寄何右丞二首〉，頁18a-b。

<sup>216</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六，〈寄徐容齋參政馬性齋右丞〉，頁16a-b。



隱退，在詩文中他屢屢念及「歸舟」。元貞元年清明，他悵歎「恨天涯，留春未辦，却留餘住」，婉言「千百計，不如去」。<sup>217</sup> 元貞二年寒食，他抱憾「一官直在松江上，却恨催歸欠杜鵑」。<sup>218</sup> 然而他的願望終究沒能實現，在這一年他就去世了。

在前文中，已討論了翰林諸臣面臨的極大輿論壓力。同樣捲入桑哥輔政碑事件的張之翰顯然也曾備受這樣的議論，「幾被傍人生訕侮」。然而這樣的議論對張之翰卻有些不公。至元二十六年的閻復已任為翰林學士，老於仕宦，久「處深嚴十餘載」，「獨擅」誥令典冊的撰寫，在翰林國史院，應是「執其牛耳」的人物，桑哥輔政碑文應該是由他撰寫完成。<sup>219</sup> 他與桑哥之間可能還有著良好關係，至少不是其理財的反對者。<sup>220</sup> 這或許也是桑哥剛倒臺不久，忽必烈還想任命他為執政，參決政務的一個原因。<sup>221</sup> 張之翰的情況卻與之有著很大不同。他長期任職於地方，至元二十三年才進入大都任職戶部，二十六年左右才進入翰林院。他在翰林院中的資望、閱歷，顯然不能與閻復相比。只有近三年中央工作經驗的張之翰，任職翰林不到一年，僅僅由於身分的原因，列名於桑哥輔政碑文撰寫者的名單中。而後竟因此事遭人攻訐，受到處罰，以至在翰林院難以立足，「人方睥睨鬼揶揄，玉堂固好非所居」。<sup>222</sup> 只是因為身不由己側名其中，便被「訕侮」於名節有虧，成為他終身背負的政治污點，則又未免太過苛刻。

張之翰大約性格上又不是一個很圓滑、善於保護自己的人。在這一點上，他

<sup>217</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二，〈金縷曲〉，「乙未清明」，頁 11b-12a。乙未，即元貞元年。按據《西巖集》卷三〈和愚公韻〉中云：「五湖何日遂歸去，再拜問天終不許。」（頁 7b）張之翰應曾請求辭任，但未獲批准。又依詩中接下有「三年蹤跡寄舟楫」之語推斷，詩當也作於元貞元年。

<sup>218</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八，〈寒食郭西〉，頁 16a-b。按詩中有云「草草杯盤第四年」，同卷元貞二年的詩作〈丙申元旦〉有「四載因循留谷水」之語，判斷詩當作於元貞二年的寒食。丙申，即元貞二年。

<sup>219</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四，〈送翰林學士閻公浙西道廉訪使序〉，頁 8b；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七，〈閻復神道碑銘〉，頁 10a, 14a。

<sup>220</sup> 桑哥理財是當時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當時官僚但凡有反對桑哥其人其事的經歷，都會在履歷中作為一項壯舉而稱耀。如趙孟頫、趙與峕、徹里等人。徹里更稱扳倒桑哥使其「有萬世名」，見楊載，〈趙孟頫行狀〉，趙孟頫，《松雪齋文集·附錄》，頁 6b。而長期任職翰林的閻復的碑銘傳記中，則絲毫沒有記載他曾有過類似的舉動。

<sup>221</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七，〈閻復神道碑銘〉，頁 12a。

<sup>222</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三，〈寄答徐容齋參政〉，頁 7a。

與閻復、李謙、趙孟頫等人都有著較大區別。<sup>223</sup> 他曾經描述自己「平生慷慨若豪士」、「嫉惡太明無乃魯」。<sup>224</sup> 這種率真、剛直的性格顯然不適合應對錯綜複雜、殘酷的政治鬥爭，遇到挫折後極易「憂傷病沮，不能復振」。<sup>225</sup> 捲入事件遭遇清算的仕途挫折無疑使張之翰受到沉重的打擊，他不時表現出自卑的失敗感：「至此羞澀如處女，曲躬顧影亦可憐」、「金杯先怯十分深」、「忘却松江職分卑」、「已離猶自防遭謗，未滿如何敢寄詩」。<sup>226</sup> 在受貶之後的最初幾年，他勤於政事，希圖通過這種方式改變命運，得到某種程度的「平反」。<sup>227</sup> 當努力失敗後，他又不免極度失望，流露出「情緒苦」、「悵無地、著羈愁」，甚至於借酒澆愁，「都變酒醉裏」，「日日醉扁舟」。<sup>228</sup> 長期的政治冷遇使張之翰的身心飽受極大的煎熬和壓抑痛苦。相比閻復、李謙，張之翰享年只有五十四歲，<sup>229</sup> 在任職松江的第四年，便鬱鬱而終。在他死後，年長十歲的昔日僚友李謙為他撰寫神道碑銘。瞭解張之翰經歷與性格的李謙，在銘文結尾連用兩次「胡遽然與」，<sup>230</sup> 其內心對他抑鬱卒亡的悲痛和惋惜可想而知。

承受著巨大心理壓力、性格剛硬的張之翰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很可能已心灰意冷。他曾著有一篇與其他詩作風格迥異的七律，<sup>231</sup> 題為〈鏡中燈〉。全詩云：

<sup>223</sup> 閻復毋庸再論。李、趙都很善於保護自己。李謙於仕宦屢進屢退，中統初年因不欲為吏，即辭職。除至元二十六年因疾引退外，其在成宗、仁宗時期，也曾力辭引退，見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李謙傳〉，頁 3767-3768；王惲，《秋澗集》卷八一，〈中堂事記上〉，頁 8b。趙孟頫與桑哥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又保持距離，比較懂得保護自己。參見陳爽，〈忽必烈時期南方士大夫政治地位的浮沉〉，頁 17。

<sup>224</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三，〈和愚公韻〉、〈寄李都司具瞻〉，頁 8a, 10a。

<sup>225</sup>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四，〈賈誼論〉，頁 106。

<sup>226</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三，〈和愚公韻〉，頁 8a；卷六，〈寄何右丞二首〉，頁 18a-b；卷七，〈陪臺察諸君養樂園宴集二首〉，頁 16a。

<sup>227</sup> 白珽，《湛淵集·贈張知府周卿》，云：「來暮已聞歌五袴，平反何翅祿千鐘。」（頁 23a）

<sup>228</sup>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一，〈太常引〉，「寄鄉中諸友」，頁 5a；卷一二，〈金縷曲〉，「乙未清明」，頁 11b。

<sup>229</sup> 閻復（1236-1312）、李謙（1233-1311），分別享壽七十七、七十九。見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李謙傳〉、〈閻復傳〉，頁 3768, 3774。

<sup>230</sup> 陳槩，嘉靖《廣平府志》卷八，〈古蹟志·陵墓類〉，頁 15a-b。

<sup>231</sup> 關於張之翰的詩詞，四庫館臣曾云「其詩清新宕逸」，有學者評價「西巖之詞，清新爽朗，豪放飄逸」。同時，又批評「西巖詞之好處在乎『清新豪逸』，可是有時候頗覺得沉厚不足，缺乏了一種凝重感」，見黃兆漢，《金元詞史》，頁 200-203。總的來說，張之翰的詩詞風格，是清新飄逸。這首七律無疑是風格迥異，頗為「沉厚」，很有「凝重感」的。

孤影徘徊入照臨，西風不動影沉沉。一池鉛水鎔真火，半夜金星犯太陰。雞翅舞時紅焰歇，蛾頭撲處碧光深。縱渠百鍊千燒後，依舊剛明一片心。<sup>232</sup>

全詩莊嚴深沉，格調凝重。在孤僻清冷的深夜，柔弱的燈芯孑然、頑強地燃燒，發出淒美的光明。世事如鏡，人生如燈。詩人在此詠物言志。詩作雖沒注明撰寫時間，但詩意與他晚年的心境很相符合。人生的最後階段，在飽嘗失意之後，張之翰或許比常人更能體會政治的險惡、仕宦的艱難。這首詩被視為他的代表作，以致「膾炙人口，人目為張鏡燈」。<sup>233</sup> 然而，當人們激賞、傳頌他深自苦吟的詩作時，又有誰知道他彼時真正的心情呢？！

（本文於民國一〇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收稿；一〇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通過刊登）

## 後記

本文撰寫、修改過程中，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劉迎勝教授、楊曉春教授、蔡晶晶博士，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業師張帆教授、党寶海副教授，中央編譯局周思成博士，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向珊博士，西南民族大學旅遊與歷史文化學院張衛忠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陳曉偉博士，均曾給予有益教示。特別是三位匿名審稿人，給予了非常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sup>232</sup> 傅習編，《元風雅前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8冊），卷八，〈張周卿·鏡中燈〉，頁6a。按，這首詩作收錄於多部史籍中，只是個別用字有所不同，「影」或作「竟」，「水」或作「汞」，「鎔」或作「藏」，「舞」或作「拍」，「歇」或作「息」，「撲」或作「觸」。見顧嗣立、席世臣，《元詩選·癸集》，頁225。

<sup>233</sup> 陳棐，嘉靖《廣平府志》卷一二，〈賢行志·鄉賢〉，頁13b。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王士點、商企翁編，高榮盛點校，《秘書監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王夫之，《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5。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明代修補元至治元年刻本影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00-1201冊。

王惲著，楊曉春點校，《玉堂嘉話》，北京：中華書局，2006。

方回，《桐江集》，收入阮元輯，《宛委別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中華書局編，《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6。

元鳳林書院輯，《精選名儒草堂詩餘》，元刻本。

白珽，《湛淵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8冊。

永瑆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李世昌等纂，民國《邯鄲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據民國二十八年刊本影印。

李庭，《寓庵集》，收入繆荃孫輯，《藕香零拾》，北京：中華書局，1999。

李賢等，《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據明天順刻本影印。

吳澄，《吳文正公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據明成化二十年刊本影印。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

周南瑞，《天下同文集》，收入羅振玉，《雪堂叢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刺失德丁著，波義耳英譯，周良霄譯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柯劭忞，《新元史》，北京：中國書店，1988，據一九三〇年庚午重訂本影印。

柯維騏，《宋史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4。

姜南，《投甕隨筆》，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1915。

胡祇遹，《紫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6冊。

- 胡儼，《頤庵文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7 冊。
- 柳貫，《柳待制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據元刊本影印。
- 姚燧，《牧庵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1 冊。
- 馬祖常，《馬石田文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據明刊本影印。
- 袁桷，《清容居士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元刊本影印。
- 張之翰，《西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4 冊。
- 張伯淳，《養蒙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 張萱，《西園聞見錄》，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據哈佛燕京學社一九四〇年刊本影印。
- 張鉉著，田崇校點，《至正金陵新志》，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
- 張養浩，《張文忠公文集》，元刻本膠卷，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陳孚，《陳剛中詩集》，收入陶湘，《托跋廬叢刻》，北京：中國書店，2011，據明洪武本影印。
- 陳宜甫，《秋巖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2 冊。
- 陳垣編，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陳高華、張帆等點校，《元典章》，北京：中華書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 陳棐修，嘉靖《廣平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據明嘉靖二十九年刻本影印。
-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
- 陶宗儀纂，《說郛》，北京：中國書店，1986，據涵芬樓一九二七年刻本影印。
- 屠寄，《蒙兀兒史記》，北京：中國書店，1984。
- 清敕撰，《欽定詞林典故》，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9 冊。
- 許衡，《魯齋遺書》，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未署出版年月，第 91 冊，據明萬曆二十四年江學詩等刊本影印。
- 馮子振著，王毅輯，《海粟集輯存》，長沙：嶽麓書社，2009。
- 程敏政著，何慶善、于石點校，《新安文獻志》，合肥：黃山書社，2004。
- 程鉅夫，《程雪樓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據清宣統二年陶氏覆刻明洪武本影印。
- 傅習編，《元風雅前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8 冊。
- 虞集，《道園學古錄》，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明景泰翻元小字本影印。
- 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舊鈔本影印。

曾廉，《元書》，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宣統三年層漪堂刻本影印。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元刊本影印。

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漢藏史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聞人詮等修，《南畿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24冊，據明嘉靖間刊本影印。

趙孟頫，《松雪齋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元刊本影印。

劉仁本，《羽庭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6冊。

劉秉忠，《藏春詩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1冊，據明刻本影印。

劉壎，《水雲村泯稿》，明天啓刊本膠卷，北京：北京圖書館藏。

劉壎，《水雲邨詩餘》，收入《疆邨叢書》，民國十一年（1922）刻本，南京：南京圖書館藏。

歐陽玄，《圭齋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明成化刊本影印。

鄭麟趾，《高麗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第159冊，據明景泰二年朝鮮活字本影印。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收入《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6冊。

錢穀編，《吳都文粹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85-1386冊。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明本影印。

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

蘇天爵編，《國朝文類》，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據元至正二年杭州路西湖書院刊本影印。

蘇天爵編，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77冊，據元至正刻本影印。

釋祥邁，《大元至元辨偽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77冊，據元刊本影印。

顧清修，正德《松江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正德刻本影印。

顧瑛，《草堂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顧嗣立編，《元詩選·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顧嗣立、席世臣編，《元詩選·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 二・近人論著

丁國範

- 1989-1990 〈至元大德年間的「賽梁秉政」〉，《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2/13：20-28。

中村淳

- 1996 〈蒙古時代「道佛爭論」的真相——忽必烈統治中國之道〉，《蒙古學信息》1996.2：1-7。

毛海明

- 2013 〈北方漢族士人官僚與元代前期政治〉，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毛海明、張帆

- 2014 〈史彬事迹鉤沉〉，《中國史研究》2014.1：125-147。

尹偉先

- 1998 〈桑哥族屬問題探討〉，《民族研究》1998.1：80-83。

王毅

- 1990 〈馮子振年譜〉，《中國文學研究》1990.1：54-58。  
2001 《馮子振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王頌

- 1981 〈「斂財」之臣與元世祖——試論阿合馬等的「理財」及其與忽必烈的關係〉，《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5：60-69。

王樹林

- 2008 〈元前期北宗文派七家文集彙考〉，《南通大學學報》2008.5：57-61。

仁慶扎西

- 1984 〈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西藏研究》1984.2：53-59。

李治安

- 2004 《忽必烈傳》，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軍

- 2005 〈資兼文武三晉英豪——崔斌其人及其詩〉，《山西大學學報》2005.1：90-93。

沈衛榮

- 1987 〈一部珍貴的藏文史集——《漢藏史集》〉，《西藏研究》1987.2：135-138。

毛海明

伯戴克 (Luciano Petech)

- 1980 〈元代的藏族政治家——桑哥〉，《東方學報》（匈牙利）34；後收入沈衛榮譯，《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二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頁 208-230。

周良霄

- 1986 《忽必烈》，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周清澍

- 2011 〈論少林福裕和佛道之爭〉，《清華元史（第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38-73。

孟繁清

- 2012 〈韋軒李公考〉，《中華文史論叢》2012.4：349-358。

洪金富編

- 2004 《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姚從吾

- 1982 〈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姚從吾先生全集》，臺北：正中書局，第 7 冊，頁 1-85。

唐長孺

- 1989 〈補元史張易傳〉，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頁 582-594。

徐凌雲

- 1993 〈白樸交游考辨八題〉，《文學遺產》1993.6：80-81。

党寶海

- 2014 〈李槃與劉秉忠文集〉，《元史論叢（第十四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陸峻嶺、何高濟

- 1982 〈從窩闊台到蒙哥的蒙古宮廷鬥爭〉，《元史論叢（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30-46。

張帆

- 1988 〈元代翰林國史院與漢族儒士〉，《北京大學學報》1988.5：75-83。
- 2001 〈論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徵〉，《北大史學（第八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50-75。
- 2005 〈《退齋記》與許衡劉因的出處進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態之一斑〉，《歷史研究》2005.3：69-84。



陳高華

- 1990 〈《元史》纂修考〉，《歷史研究》1990.4：115-129。

陳爽

- 2002 〈忽必烈時期南方士大夫政治地位的浮沉〉，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陳得芝

- 1996 〈程鉅夫奉旨求賢江南考〉，《內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韓儒林先生紀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後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 540-570。
- 2005 〈耶律鑄生平中被掩蓋的一段經歷〉，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頁 464-467。

黃兆漢

- 1992 《金元詞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楊德華

- 1995 〈元代藏族宰相桑哥理財的政績〉，《中國藏學》1995.4：64-69。

劉立華

- 2006 〈元代詞壇上的父子詞人——張之翰、張堃詞研究〉，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

劉迎勝

- 1996 〈蒙哥即位風波中的察合台、窩闊台系諸王〉，《內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頁 69-96。

蔡春娟

- 2007 〈李璫、王文統事件前後的王惲〉，《中國史研究》2007.3：105-110。

鄧瑞全、孟祥靜

- 2013 〈張之翰《西巖集》點校整理筭記〉，《歷史文獻研究（第三十二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211-213。

羅賢佑

- 1991 〈論元代畏兀兒人桑哥與楔哲篤的理財活動〉，《民族研究》1991.6：102-109。

毛海明

Analysis of the “Stele for Sangha’s  
Assistance to the Emperor (*fuzhengbei*) Incident”:  
A Case Study of the Bureaucratic Career of Zhang Zhihan

Haiming Mao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This essay makes an analysis to the “Stele for Sangha’s Assistance to the Emperor (*fuzhengbei*) Incident” in the early rule of the Yuan dynasty. Many officials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were implicated and punished because of this incident, whose occurrence and outcome have a profou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due to the lack of evidential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cademia did not probe deeply into the matter. By looking into the bureaucratic career of Zhang Zhihan, who once worked in the Imperial Academy, this essay reveals some new facts about the “Sangha’s *fuzhengbei* Incident,” and explores some details of the political struggle during Qubilai’s later reign.

**Keywords:**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Sangha, “Stele for Sangha’s Assistance to the Emperor (*fuzhengbei*) Incident,” Zhang Zhihan, Han officials, politic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Qubilai’s reign